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2

1959

目 录

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	孙 孺 (1)
试论我国当前的农民同盟军问题	丽 石 (5)
客观经济规律只能运用不能消灭	唯 思 (8)
从三元里人民公社的情况谈公社分配的几个问题	集 群 (11)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我国教育科学的重大贡献	张其光 (14)
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与实用主义反动教育观点的根本区别	李共水 (17)
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东莞劳动百日的收获	中共中山大学历史系总支委员会 (21)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体会 (笔谈)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初步经验	王 越 (25)
我们在劳动锻炼中获得了什么?	王多恩、桂灿昆 (26)
在干部学校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体会	古子坚 (27)
我国教育史上的大革命	阮镜清 (28)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展开教学改革运动	汪德亮 (29)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点滴体会	杜伯奎 (3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争取学校工作更大胜利	严永晃 (31)
教学改革中的若干体会	杨荣国 (32)
对于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	杨荣春 (33)
我对教学改革的体会	陈锡祺 (33)
下乡三月余,胜读十年书	陈则光 (34)
党的教育方针完全适用于外语专业	戴镛龄 (35)

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稿	杨荣国 (37)
------------------	------------

评岑仲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 (包括封建制度) 来自突厥说	胡少华 (41)
--------------------------------	------------

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	阮镜清 (45)
-----------------	------------

第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

——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	艾治平 (48)
------------------------------	------------

大小之间	何家言 (51)
------	------------

迷信与科学	夏 枫 (52)
-------	------------

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问题的一些看法	余 璜 (53)
--------------------	------------

我看到了农民学哲学的好处	黄义祥 (54)
--------------	------------

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问题的讨论 (资料)	(55)
-------------------------	--------

动态

多种“工厂史”、“公社史”已完成初稿
“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参考图片集”将于四月完稿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初稿即将完成
广州高等院校采用三结合方式编写教学大纲及讲义
广州举行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座谈会



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

孙 孺

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这几种过程是怎样互相联系和互相区别的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使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起了重大的变化。在所有制方面，它使原有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而且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因此，它就不仅仅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量的积累，而且起了若干程度的质的变化，全民所有制的新质态，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它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但是，它又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就已经使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另外一种发展过程，这一个过程，还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在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步骤逐步实现。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和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两种过程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区别的关系。

其次，将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形式，逐步转变为单一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

义过渡，就是到完成了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因为前一个过渡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高，后一个过渡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水平以及其他的相应的条件的成熟，因而需要比实现全民所有制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全面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将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就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和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两种过程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区别的关系。

再次，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同时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成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但是这绝不是说，人民公社化就意味着我国社会已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当前的任务，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通过人民公社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因素将逐步增长，它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和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两种过程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区别的关系。

必须正确认识这三种过程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才能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既发挥冲天干劲，完成每一个时期的革命任务，又保持冷静

的头脑，掌握客观的发展规律，使我国人民有步骤地、有节奏地完成这几种过程，到最后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二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它们具有共同性而又存在着区别。这两种所有制是在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通过不同的方法，消灭了剥削阶级废除了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是基本的一面。在农业经济中，将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通过互助组的形式组织起来，再经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在农业中废除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公有制（还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是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在工业经济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中，通过没收的办法（属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企业部分）与和平改造的办法（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部分）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采取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公有制。目前，在农村中是以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在城市中是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为主要形式。

这两种所有制的形式又有所区别。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包括生产资料产品和生活资料产品）是属于部分的人民的集体所有，还不可能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当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基本上还是这种性质，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公社的集体所有（由县联社的扩大到联社的集体所有）。它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只能在公社的范围内统一调配，它的产品除了用于公社扩大再生产和分配给社员之外，和国家的联系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纳税和上缴利润（上缴利润部分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成分）的形式交由国家统一分配；一种是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交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全民所有制则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所有，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按照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人民之间作统一的合理的调拨与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不是属于某一部分人民所有而是属于全民所有，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统一调拨分配。这就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品，不是属于某一部分人民所有而是属于全民所有，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统一调拨分配。这就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目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虽然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但它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单纯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不同，因为它已经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已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我国乡一级的政权，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一般的情况，目前和人民公社合而为一的基层政权比过去的乡政权扩大了，一个公社往往包括了若干个乡。）它和公社合一之后，由公社统一调度和分配的生产资料、产品和人力，实质上也就是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基层政权统一调度和分配。同时，通过政社合一的形式，可以使人民公社的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直接地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使国家的计划和公社的生产计划基本上统一起来。这些都是体现了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二）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进一步接近和联系起来。有人怀疑，将全民所有的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是不是向集体所有制后退了？其实这是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本质所产生的一种误解。因为把某些国营企业下放给公社，是下放管理和使用权限，并不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因为这些机构下放以后，一方面成为公社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又还是国家财贸部门的基层单位或国家的企业。首先，下放的财贸机构的生产和企业的生产是服从于国家的统一政策、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流动资金的管理；其次，归公社经营管理的财贸机构和工业企业，必须把整个收入中的一个适当的部分，经过财政任务上缴利润的形式交给国家，因而它的积累的一定部分是由国家直接支配而不归公社自由调动的；再次，国家财贸、企业部门还要对下放的机构继续进行业务领导，这也加强了国家对人民公社的领导，加强了国营经济对人民公社经济的直接领导，使人民公社经济和全民所有制进一步接近和联系起来。所以，这不是后退而是前进。

（三）人民公社利用大和公的特点，兴办了某些较大的工业和农业基本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

大水坝、灌溉渠、发电站、修筑道路等等），实质上都已经越过了一个公社集体所有的范围而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四）由于许多县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和原有的县政权合而为一，县联社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调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全县性的或者超过县的范围的建设事业，实质上是“大集体小全民”，使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成为一种特殊的融合。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中增加了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具体表现。

三

逐步地使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这将标志着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但是这个变革的迟早，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而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这种变革的客观条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因而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同志最近在苏共第廿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所有制的形式不是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

从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须具备什么程度的生产发展水平呢？由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因而这个过渡的具体条件也不会完全相同。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意味着原来属于局部的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提高到属于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由国家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调度。社会产品也由原来在局部的集体范围内分配提高到由国家根据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进行统一的分配。因而生产发展的水平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国家有可能掌握比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进行更大的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国家有可能掌握比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有更多的积累和使农村的个人所得提高到与城市的个人所得相接近的社会产品。即是说，应达到有利于更大规模

地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人民的觉悟水平也须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使公社社员的眼光有可能从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全民的利益，冲破狭隘的平均主义思想，树立自觉的“各尽所能”的劳动态度。只有在这样的生产发展水平和觉悟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在我国条件下，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程度的不同，条件成熟的时间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转为全民所有制的時間也就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所以，决议中指出：“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八月决议中也曾经明确地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虽然生产大大地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有很大的提高，但就整个农业生产而论，一般还是处在手工的或半手工半机械的基础上的生产，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还必须大力发展人民公社的生产，使它不仅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还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生产，为全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增加公社的积累，进行机械装备，实行技术改革，在更大的规模上扩大再生产，从而使产品进一步丰富，社员的个人收入也逐步有所增加，为转为全民所有制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同时，还必须认识，在条件成熟以前，集体所有制还是适合于当前生产力的性质的，因而，它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目前，还必须使广大的社员在关心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集体所有制使它向全民所有制发展，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将不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是适当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

避免过早地、过于性急地在农村中将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绝不是说不作主观的努力使条件逐步成熟，以促进这个过渡的实现。我们尊重客观规律，并不是贬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客观规

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轉移的，人不能改造客观规律，但当人認識了客观规律，就可以掌握它，利用它，可以用人的主观努力創造原来不具备的条件或促使尚未成熟的条件加速成熟。当我们認識了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客观发展规律之后，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一特点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大力发展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在社員中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社員的觉悟水平以促使过渡条件的成熟，及时完成这种轉变。

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采取怎样的具体方法呢？赫魯晓夫同志在苏共第廿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談到：“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和全民所有制形式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融合，将来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的收縮，而是通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援下提高它的公有化的水平而发生的。”这是适用于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性的理論。对我国也具有理論和实践的意义。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国家将通过怎样的方法来帮助和支援人民公社，提高它的公有化的水平呢？

（一）各县应当普遍地成立統一领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在較大规模較大范围内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各个公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普遍地超过一个公社的集体的范围，进行全县性的統一調度，使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在更大的程度上納入国家的直接計劃內，按照国家的需要安排生产，这就将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提高，

并和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融合。

（二）通过国家将財貿机构的基层单位下放給公社管理的办法，使国家的財貿机构可以直接领导公社的財貿工作，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統一分配的成分，逐步增加公社的財政、現金由国家統一調度的成分。

（三）通过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公社收入的增加，可以保证工資和供給标准得到提高并逐步趋于固定，不受公社收入的多少影响，从而逐渐使社員的个人收入部分和公社的集体收入游离开来。就将使社員更易于接受向全民所有制的轉变。

（四）在大力发展公社生产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对社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觉悟水平。使社員的思想逐渐从关心集体的小圈子的利益提高到对全民的利益关心。这样，就有利于将集体所有制轉变为全民所有制。

通过这些方法，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逐步提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轉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来，这一个过渡，将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較早地完成。如果看不到这点，将这—个过渡推延到較迟的将来也是不对的。因而決議又指出：“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轉变，老是維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員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繼續发展和人民觉悟的繼續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

多种“工厂史”、“公社史”已完成初稿

去年下半年广州市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暨南大学等派出了許多教师和学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一起編写“工厂史”、“人民公社史”、“乡志”、“县志”等等，据我們了解，现在已完成初稿的有“华南縫紉机厂厂史”、“东莞县志”、“东莞常平人民公社史”、“篁村营志”、“燕塘营志”、“亨美人民翻身史”、“英联人民翻身史”、“常平鋼铁厂史”、“番禺人民公社史”等等初稿十种。

这些“工厂史”、“公社史”等初稿，是通过党委挂帅、发动群众、組織专业力量共同搜集材料，綜合整理編写成功的，許多資料都經過审慎研究，編写时注意它的特点。这是在我国历史科学研究的新的方向下所取得的新成績。华南师范学院十四个师生、暨南大学一百多师生通过这次下厂下乡和工人农民一起編写厂史、公社史，不仅在科学研究上認識了群众路綫的作用，而且在思想上的收获很大，認識到劳动人民創造历史和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

已經完成的各种初稿共达一百多万字，有些初稿还詳細附有插图和解说。为了慎重起见，上述各校师生还准备把初稿进行再次审查和加工修改，定稿后将有多种交出版部門出版发行。

試論我国当前的农民同盟軍問題

丽 石

农民同盟軍問題是我国革命的根本問題。我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工人階級领导农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实现土地革命的問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階級领导农民最后离开資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在这两场伟大的革命中，由于我們贏得了农民，因此就贏得了胜利。

现在，我們的任务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并創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同盟軍是否仍然是一个主要問題呢？應該肯定地說，仍然是一个主要問題。因为要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将来建設共产主义，归根到底要依靠六亿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而五亿农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階級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工人階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将随着革命的进展而不断巩固，不断发展。今天工农联盟的新的基础是已經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不但在促进当前的生产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同时也給我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道路以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因此人民公社将促进工农联盟的日益巩固与发展，也将成为五亿农民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因此，巩固人民公社与巩固工农联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譬如：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質？究竟是一个过渡还是两个过渡？在今后一个时期內商品生产还有沒有作用等等問題，會有不少爭論，也有不少模糊观点。产生模糊認識的原因是对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中的阶段性之間的辯証关系認識不足，同时也是对一个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

是在建成社会主义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如何正确对待农民同盟軍問題認識不足。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有人誤認為农村已經进入共产主义了，以为在短期內可以把公社轉为全民所有制，以为商品生产沒有作用可以消灭了，以为农民已經跑到工人的前面，农村已經跑到城市的前面，可以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必有两个过渡，等等。这是一种急躁情緒。这种情緒實質上是对农民的看法不够全面，他們看到了农民的革命性，看到了农民的冲天干劲，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愿意走向共产主义的一面，但他們忽視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艰巨性，忽視了党对农民的領導必須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农民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引导他們走向共产主义的一面。这种急躁情緒，往往会造成欲速不达，脱离广大群众，其結果必将脱离五亿农民。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對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形势認識不足而产生右傾保守思想，他們对在整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照耀下出現的亘古未有的大跃进局面認識不足，对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必然趨勢認識不足。他們認為高級社也可以实现两个过渡，人民公社和高級社之間沒有多大差别，人民公社是可有可无的。在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他們又不适当地夸大工作中的缺点，并認為目前工作中产生的缺点是由于公社化的結果。所有这些观点，實質上是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不相信党可以领导农民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了解广大貧农、下中农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貧困境地的心情。不論急躁情緒或者是右傾情緒都不可能正确对待农民同盟軍，不可能用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的阶段論相結合的观点正确地领导农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过渡的問題，實質上也就是工人階級如何領導農民建成社會主義並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我們黨會根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考慮到中國農民的特點，領導農民從個別經濟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從小集體到大集體，並通過人民公社的形式逐步將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今天的人民公社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它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的，因此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集體所有制的潛力，不要脫離當前生產力水平和群眾的覺悟程度過急地使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這樣會對生產不利，會脫離農民群眾，不利於工農聯盟；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逐步增加公社生產資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產品由國家統一分配的部分；國家下放給公社管理的企业和財貿機構必須充分發揮它的作用，這些機構一方面成為人民公社的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國家財貿部門的基層單位，因此加強這些機構的作用也就是加強了國家對人民公社的領導，也便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在整社基礎上迅速建立縣聯社也是增強全民所有制成分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樣才能使全國的生產在一盤棋的基礎上統一指揮，靈活調動。也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站在農民前頭，領導農民不斷前進，不使他們的眼光老是局限在小單位利益的圈子裡，使工農聯盟的基礎日益鞏固與發展起來。

在現階段究竟要不要發展商品生產？當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後，商品生產會不會消失？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實質上，也反映了我們究竟如何對待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麼要保留商品生產呢？因為它是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之間必須採取的一種聯繫形式。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可以進行剝奪或採取贖買的形式轉變為全民所有。但對個別生產者（其中最主要就是對農民）只能在他們自願的基礎上，逐步把他們從個別經濟聯合到集體經濟中來。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形式的存在，是小生產者眾多的國家生產不發達的必然結果。既然有二種形式的所有制，它們之間的聯繫就必須通過商品。列寧曾告訴我們：“為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我們黨根據馬列主義這一原理，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發展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利用了價值規律，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對小農經濟進行了改造，以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逐步代替

了資本主義和個別經濟的商品生產，同時也利用它聯繫了城鄉、工農經濟，團結了五億農民，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實踐早已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有本質上的不同，後者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在自由競爭、無政府狀態下進行的，它一面為資本主義服務，同時又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促使資本主義的滅亡；前者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計劃地進行的，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它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促進生產的發展。而且既然農民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權，把他們的产品不經過交換而歸全民所有，這實際上等於對農民的剝奪，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建成社會主義和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內，我們仍然要利用商品生產把五億農民從集體所有制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在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全面實現之後，如果產品還不十分豐富，還不能按需分配的時候，商品生產還可能保留一個時期。如果想在生產力水平還沒有發展到足以生產極大豐富的產品，以滿足人民需要的時候，過早地消滅商品生產，就會脫離農民，對生產不利。

建成社會主義以及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中心問題，是要通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必須建築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產品的無限豐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之一。而要高速度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和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其中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用先進的技術把農業裝備起來，使五億農民從手工操作，從肩挑手鋤轉向機械化、電氣化。這是鞏固和發展公社的重要條件，也是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生產的發展是很迅速的，但生產力水平仍然很低。因此在堅持工農業生產並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並舉的方針下，必須大力進行技術革命，實行工具改革，從半機械化逐步轉向機械化，電氣化。為農業服務的公社工業要大力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民較為迅速地從手工操作中解放出來，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我黨領導農民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艱巨的歷史任務。

在建成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中，還必須極大地提高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必須普及提高全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及逐步地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在這些措施中，中心問題還是五億農民問題，這不僅僅因為農民是多數，他們占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五；同時還由於他們從小生產

者轉到集体生产者的時間还不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識的残余以及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低下的状态，还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解决。因此对五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就成为建成社会主义以及今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工作，目前农村文化革命正在形成高潮，学校林立，詩歌滿墙，随着公社的巩固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也将普及起来。从目前整社情况看起来，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还赶不上公社发展形势的需要，去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全部劳动力立刻投入紧张的冬耕和鋼鐵生产，当时也曾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对公社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但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够的，特別对公社的性質，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結合，共产主义劳动与按劳分配制度相結合，共产主义与本位主义的界限等等問題还来不及进行系統的深刻的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是工农联盟的思想基础，也是公社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目前特別突出的、与共产主义思想不相容的是本位主义思想。有了本位主义，人民公社不能巩固，

今年的更大跃进也会受影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必須反对本位主义。本位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原因。在公社成立前，無論生产和分配都是以小社范围进行的，现在由公社統一調动統一分配，因此就产生了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用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才能促进生产，巩固公社，如果用本位主义来解决問題，只有促退生产，妨碍公社的巩固与发展。因此，反对本位主义，并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和广大农民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任务。

正确地对待农民同盟軍問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只要我們充分地估計和發揮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艰苦深入地對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貫徹党中央制定的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巩固工农联盟，帶領五亿农民建成社会主义，并在不久的将来向共产主义迈进。

“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將于四月完稿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档案馆和广州市博物館等单位，正在联合編輯一套“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項目之一。

編輯这套图片集的目的是为編写中小学教材、乡土教材及革命历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并通过这种形象的、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照片，来反映广东省人民近百年来，特別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反軍閥买办的英勇斗争。从而使讀者受到具体的形象的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

这套图片集接近代、现代史分期，并以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近代史部分分为三个单元：（一）1840—1866年广东人民反抗外国資本主义的侵略和反封建的斗争；（二）1866—1901年广东人民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的斗争、反对瓜分中国的斗争；（三）1901—1919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前后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内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資料，着重表现广东省人民革命斗争的史迹。

现代史部分分为四个单元：（一）1919—1929年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二）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三）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四）1945—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套图片集的資料来源，除参加編輯单位收藏的以外，还得到省博物館、革命历史博物館、老根据地建設委员会、广东軍区、广州軍区、华南师院、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大力协作，同时还广泛地征集本省各市、县有关单位和个人所收藏的图片資料。

目前，編輯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預定四月分完稿。（楊式挺）

客观經濟規律只能运用不能消灭

唯 思

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伟大时代。全国人民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充分表现着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指导下的具有高度自觉性和組織性的人民群众，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它使右傾保守的悲观論者瞠目結舌；也使匍匐在客观条件面前，“繞着客观規律打圈子”的机械唯物論者百思不解。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証明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多么广阔的场所；同时也証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能够做出多么宏伟的近似奇迹的事业。

在这种有利形势面前，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主观作用是万能的，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客观規律已經不起什么作用了，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有着党的英明的领导，有着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干劲大、风格高、革命意志坚决的人民群众，客观規律的作用特别显得微乎其微了；甚至觉得，在这样的主观能动性面前，客观經濟規律是可以任意改变或“加以消灭”的，认为我們可以而且应该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来随意“消灭”那些妨碍我們迅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規律”。

对待客观經濟規律持这种主观主义的粗暴态度，显然是反科学的，极端錯誤的。

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在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識的客观規律发生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謂規律，就是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內在联系、相互依賴和互相制約的关系。人們不能任意創造或消灭这些客观規律（包括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但是他們能够認識

这些規律，然后掌握这些規律，限制它发生破坏作用的范围，引导它向有利于人們的方向发生作用。經濟規律不同于自然規律的特点之一在于：大多数經濟規律并不是长久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和发生作用，当社会經濟生活改变以后，它們就会让位于反映这种新社会經濟生活的新的經濟規律。但是，新的經濟規律并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經濟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旧有的經濟規律也不是被人們加以消灭了，而是由于新的經濟生活的出现而失去了效力，退出了舞台。不尊重客观經濟規律，就是不尊重客观事物，不尊重辯証唯物論，这在思想方法是主观唯心論，而在工作上則將招致錯誤和損失。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形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結果，是工人階級政党正确运用这个規律，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結果。大家知道，1956年我国出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在經濟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1957年又进行了全民整风和反击资产階級右派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克服了衰朽力量的反抗，获得了更广阔的作用场所。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就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員的物质福利和使他們得到全面的发展。我們党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新任务，指出我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时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实现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保証最大限度地

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长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党又充分估計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在提高社会生产技术时，不仅看到“物”的作用，更看到“人”的作用。就是說，在考虑如何提高社会的生产技术时，不仅考虑到生产設備、技术条件、机械化程度等等“物”的因素；同时更考虑到如何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使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最大的發揮。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运用我們党的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路綫——群众路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总结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結合，在工业战綫上以綱为綱，全面跃进等等一系列的方針，一句話，用两条腿走路而不是用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針，就是党的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是自觉地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高度發揮主观能动性的結果。这是一种战斗唯物主义的态度，它証明在客观經濟規律面前，人們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們自觉地运用客观規律，高度地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就能实现社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右傾保守主义者看不到大跃进出现的可能，在客观經濟規律面前徘徊等待，做了客观經濟規律的奴隶；但是，“左”傾冒险主义者却解释道，大跃进的出现証明主观万能，人們“想得到就做得得到”，只要人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就可以馬上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甚至半年后，一年后，最多三两年后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們不安于做客观經濟規律的奴隶，这是好的；但是，他們企图把客观經濟規律当作泥巴，可以隨自己的意志，要捏成什么样子就捏成什么样子，甚至可以消灭，这是反科学的，因而也是万万办不到的。

例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經濟条件下，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价值規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客观經濟規律决不可能不顧条件地任意加以“消灭”。党的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

“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德麟同志在“發揮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

产主义准备条件”一文中，却：提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再三強調人們只能发现、認識、依靠和运用規律，而决不能消灭規律，这些話用来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是正确的，但是有片面性”。（见“理論战綫”1958年第9期）我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斯大林強調人們能发现、認識和运用客观規律，就是說明人們在規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客观規律既然是客观事物內在联系的反映，人們認識和运用客观規律，也就是認識客观事物、运用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規律为人类利益服务的过程。辯証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总是認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主观認識是第二性的。如果硬說客观規律可以任意加以改变和消灭，这就等于說主观認識才是第一性的，客观事物是第二性的，从而将导致客观不可知論和神秘論，这不正是主观唯心主义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所以一再強調的主观与客观經濟規律的正确关系，正就是要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

德麟同志在上述文章中又肯定：“客观經濟規律可以消灭，消灭的办法就是消灭产生这个規律的前提”。是的，經濟規律不同于自然規律的特点之一，在于大多数經濟規律不是长久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作用。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客观規律的前提，也是不能随意消灭的。因为当某一客观規律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只是由于作为这一規律的前提被新的前提所代替，而不是由于什么人用主观意志把它消灭了。例如：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就不是人們可以隨便加以消灭的。它只能在社会生产极端发达、社会产品极度丰富、人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換言之，就是全社会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后，商品生产的条件才不再存在，反映这种經濟条件的价值規律才归于消失。如果認為只要随意消灭产生客观經濟規律的前提，就能消灭客观經濟規律，这在邏輯上是一种粗暴和混乱，在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的。而在实践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只要人們馬上实行产品交换，就能消灭商品生产、也就能消灭反映商品生产的价值規律。显然，这个結論是錯誤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已經批判了这种錯誤。

德麟同志为了給自己的錯誤論断找寻根据，引用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批評拉薩尔的这几句話：“如果我們废除雇佣劳动，那么自然，我們也废除它的法則，不管这些法則是‘鉄的’还是象海綿一样是軟的”（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

卷集，第二卷、第27頁），來證明客觀規律是可以消滅的。這更是完全錯誤的。只要我們不是存心斷章取義，而是認真地閱讀馬克思的原文，我們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在這幾句話的前面還有更重要的兩句話：“為了不至於把它（指拉薩爾的‘鐵的法則’——引者）失掉，竟胡言亂語，而說什麼‘廢除工資制度（應當說：僱傭勞動制度）連同其他的法則’。”這就是說，馬克思恰恰是把那些說什麼可以隨便廢除法則（即客觀規律）的人，當作是“胡言亂語”的，而決不是馬克思主張可以任意消滅客觀法則。大家知道，整個馬克思主義就是建築在承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存在着不依賴於人的意識的客觀規律，同時承認人有認識和運用這個規律的可能性的基礎上的。列寧說：“世界是物質的合規律的運動，而且我們的認識，既然是自然界的最高產物，所以只能反映這個規律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認為客觀規律可以隨便消滅，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的。

我國社會主義大躍進以來，六億人民所創造的豐富的革命實踐，不是證明人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客觀規律，而是恰恰證明，既掌握客觀規律又高度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民，也就是說，既有科學分析精神又有沖天干劲的革命人民，能够在改造客觀世界中發揮多麼重大而卓越的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就成為在我國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過程中起作用的客觀規律，它給社會生產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場所。但是，儘管如此，要將客觀可能性變為現實，還必須經過主觀的巨大努力。我們黨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就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作用、自覺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的典範。例如，我們抓住了“以鋼為綱”，這就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速度發展；但同時“以鋼為綱”又不能違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顯而易見，1958年我國經濟建設“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出現，正是正確掌握了這些規律的結果。而如果有那些個別經濟部門或工作環節上沒有很好掌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就會出現國民經濟的失調，影響全面的躍進。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人類歷史空前未有的全面大躍進，為人們發揮主觀能動作用、自覺地

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創造了最豐富的經驗。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經驗有三條：

第一、必須實行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運用，也就是掌握客觀規律、運用客觀規律來改造客觀世界的準則。任何工作，如果政治不掛帥，不加強黨的領導，就可能帶着盲目性、自流性和自發性，這也就是在客觀規律面前盲動瞎摸的表現。我國在經濟戰綫上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後，又開展了整風反右派鬥爭，取得了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這就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我國大躍進的勝利，也就是高度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勝利。

第二、必須使科學精神和沖天干劲相結合。科學分析的精神，是正確認識客觀事物和客觀世界，沖天的革命干劲則是去解決客觀事物的矛盾，改造客觀世界。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光是認識客觀規律而不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即只有科學精神而缺乏革命熱情，實際上仍是在客觀規律面前毫無作為，成了客觀規律的奴隸。但是如果只有革命熱情而缺乏科學分析精神，即只顧發揮主觀能動作用而不能正確掌握客觀規律，結果也只能是冒險盲動，徒勞無益，甚至造成壞的結果。科學精神與革命熱情相結合，是人們自覺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為社會造福的途徑。

第三、必須大搞群眾運動，這也是大躍進中所證明了一個真理。任何工作要做得多快好省，即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就非大搞群眾運動不可；不走群眾路綫，不大搞群眾運動，就只能是冷冷清清、少慢差費。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本身就是為人民造福的，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大搞群眾運動，就是使人人都組織到運用這個經濟規律的行列中來，就是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發揮到最大限度。

在黨的領導下具有高度自覺性和組織性的六億人民，掌握着、運用着客觀規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

从三元里人民公社的情况 谈农村公社分配的几个问题

集 群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即普遍实行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个新的问题。广大群众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心的，公社化后到底怎么分配？能否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能否正确处理公社的分配问题，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人民公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是关系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节国家、公社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发挥群众生产积极性和提高社员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等等的重大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于有关公社分配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广大社员群众对于这个决议十分拥护，它对于我国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根据我们对广东省广州市郊区三元里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和认识，谈谈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

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公社和社员个人三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公社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社员是否能增加收入的问题。三元里公社在确定1958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掌握了这两个原则：一方面要保证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扩大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要求社员的生活水平有适当的提高，使原来生活水平较低的有较大的改善，原来生活水平较高的也稍有提高。根据这些原则，对1958年的收入作了如下的分配：1958年末计算跨年的作物的总收入达6,600,430元，比1957年增加31.5%（如加上跨年作物可达840万元，比1957年增加41.4%）。

其中纯收入达4,413,178元，占总收入66.8%，比57年增加35.2%。

在纯收入中用于公共积累的（包括了为本社和国家的积累，但不包括为1959年预留的种子、肥料）

达1,727,331元，占纯收入39.1%，比1957年增加94.1%；用于社员消费的达2,685,847元，占纯收入60.9%，比1957年增加17.5%（1958年的社员消费数字包括农业社员和部分其他阶层9—12月份的消费数，57年的则仅是农业社员的消费数。）

社员个人收入部分，如就全年对比，增长并不多，实际生活水平只提高12.4%。但如仅就公社成立后这一段时期来看，则增长很大。1957年每个社员每月的平均收入才6.2元，而根据公社1958年11月份实行的分配制度计算，则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为11.08元，平均提高78.7%。以1958年11月和1957年每月平均收入对比，15个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小社）社员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增加收入10—20%的有3个队，增加25—30%的有5个队，增加70—90%的有2个队，增加110—135%的有5个队，而且都可以做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据远景大队188户的统计，增加收入的173户，占总户数的92.03%，减少收入的15户，占2.97%。远景大队是原来生产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在15个队中排列第三位）其他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增加收入的户数就更多了。

从以上情况来看，三元里公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基本上做到了既要适当的提高积累的比例，使生产不断的扩大，又要使社员的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保证90%以上的社员都能增加收入这个原则。从积累与消费二者的比例来看，积累部分是小了一些，只占纯收入的39.1%，这主要是由于1958年社的生产发展水平（比57年只增加收入31.5%）和原来相当部分的社员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情况所决定的。

在处理公社分配问题时，必须全面认识积累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存在着矛盾而又统一的。一般来说，积累是反映了社员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消费则反映了社员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两者在某种程度来说是有矛盾的，但从根本利益来看，它们又是一致的。积累是为了不断扩大再生产，也是为了使社员的生活今后得到不断的改善

和提高；而社員生活的改善又促進他們的生产積極性，進一步發展生产和擴大積累。發展生产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而生活的提高又必須在生产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實現。這就是兩者的辯證關係，也是個客觀規律。處理這個問題時，應該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密切結合起來，也就是要好好貫徹“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目前，妨礙正確處理公社的積累與消費關係的，主要有二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必須加以澄清和克服。一種是不考慮社的公共積累，離開生產的發展水平，要求過高的改善生活；另一種是只強調發展生產擴大社的積累，不注意適當的改善社員生活。三元里公社目前的情況，前一種思想傾向是比較突出的。在這次整社鳴放中，有不少的社員提出了改善生活的過高要求，如有些人要求公社每月每個勞動力發30元工資，過年（春節）每人要有3斤豬肉、150個煎堆，甚至有個別要求發手表等等，好像認為入了公社，生活上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馬上得到滿足。顯然，這兩種思想認識都是片面的、錯誤的，是不利於公社的鞏固和發展的。就三元里公社的情況來看，如果滿足社員的這些要求，大量增加社員消費部分的話，勢必會削減擴大生產和基本建設的資金，影響59年全面躍進計劃的實現，也必然影響到今後社員生活的繼續提高。公社1959年的分配方案（草案）規定第一季度基本保持現有的消費水平，第二季度增加12%，第三季度增加25%，第四季度增加53%。這體現了生活的改善建立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的原則，也是穩妥可靠有充分保證的。至於過分的強調公共積累，就會使社員的收入得不到應有的改善，甚至會使社員的個人收入減少，而影響他們的生活和生產積極性。這也是不利於社的鞏固和發展的。這就是只要生產、不要生活的觀點的反映，把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二者對立起來了。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生產愈是發展、愈要注意改善群眾的生活，而愈是關心群眾的生活，群眾的干劲就會越大。當然，離開生產的發展和思想教育，片面的強調改善社員生活也是極端錯誤的。

二、關於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的比例問題

在新的分配制度中，工資部分是屬於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供給部分則帶有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萌芽。應該如何確定二者之間的比例，以適應當前

的生產發展和群眾覺悟的水平，使有利於公社的鞏固和發展，這是處理公社分配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三元里公社自去年九月成立後，即實行“吃飯不要錢，又有工資領”的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從去年11月份開始從口糧供給制擴大為伙食供給制。社員家屬入托兒所、幼兒園、讀小學、初中、入敬老院以及看電影、理髮、補衣服等都不要錢，醫療費公社負責80%。每個勞動力每月平均發給6.98元的工資（其中20%為獎勵工資）。這樣二者的比例是：工資部分占35.4%，供給部分占64.6%。從今年一月開始決定將供給部分的看電影、理髮、補衣服三項取消（用以增加工資部分）。調整後的比例，則變為工資部分占40.4%，供給部分占59.6%。根據該公社1959年的分配方案，供給部分維持現有水平，社員收入主要是增加工資部分。

三元里公社對二者的比例作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正確的。1959年分配方案提出的主要增加工資部分，也是合乎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的。這就是，既要考慮到如何保證社員基本生活的需要，使90%以上的社員能增加收入，其餘的也不致於減少收入；同時還要考慮到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按勞分配的原則還應占主要地位。目前公社在調整後，供給制部分還占59.6%，還超過半數，這是因為公社生產還未有很大的發展，而吃飯、教養小孩、養老、醫病等，都是為廣大群眾所迫切要求的，故在目前即包起來或包一部分（如醫藥）也是適當的，因為這對於堅定社員對生活的信心和鼓舞社員的生產情緒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後在社員收入方面，將主要是增加工資部分，這樣按勞分配部分的比例便會迅速地增長。我們決不能離開當前的生產條件和群眾覺悟水平，過多地擴大供給範圍，因為這對公社的鞏固和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是極為不利的。首先，從三元里公社的情況可以看到，由於前一個時期包的範圍廣了一些，便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緊張現象。如理髮排長龍，有的頭髮還不长也要剪，使人次數大大增加，要補的衣服積壓了一大堆，看電影的也很擠擁，弄得不好。這就說明了，在物質條件和思想基礎還不具備的情況下，過多擴大供給範圍，不僅不能滿足社員生活方面的複雜需要，而且還可能帶來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其次，如果再擴大供給範圍，相對地把工資部分縮小的話，就會影響到勞動力多、人口少的社員的收入，減收戶將會增多，目前社員

減收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类的情況。根据远景大队的調查，15戶減收戶中，有11戶是劳动力强，人口少的。再次，應該看到，公社成立以后，从总的方面來說，劳动生产率是大大提高的，但是在一个时期和一部分社員当中也出现劳动松弛，劳动效率不高的现象，“干不干三餐飯”的思想，在一些社員中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个別不愿出勤，甚至說：“不在乎每月几元的工資”。而另一方面，有的队由于对定期評工資級別和发放奖励工資的工作及思想教育抓得比較好，特別是在貫徹了“五包、二獎、一扣”的生产責任制以后，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便有显著的提高。这些情况生动地說明，目前社員收入中工資部分不宜过小，按劳分配在今天和今后一定时期內还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八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在人民公社的社員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长时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期內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員的劳动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复杂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使社員所得的工資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得更快”。所以，在对待这个問題上，任何急躁情緒和平均主义思想都是极为有害的。

三、处理各生产队（即原来小社）之間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不平衡的問題

公社是在去年九月才成立的，1958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小社各自經營。由于各小社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別，在处理分配問題时，是否應該考虑到这些情况，作适当的照顧呢？

三元里公社在这个問題上是比較突出的。在十五个生产大队中，原三元里乡的八个队以种植蔬菜和經濟作物为主，收入較多，生活較为富裕；原加禾乡的七个队，以种植水稻为主，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較低。在成立公社时，原三元里乡即有不少人認为是“加禾乡揩我們的油水”，大叫“吃虧”，在討論1958年分配方案时也有过激烈的爭論。这反映了公社与原来各小社之間，即大集体与小集体社員互相之間的矛盾問題。

三元里公社对这个問題的处理，除了一方面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外，另一方面还同时掌握了既要統一分配、又要适当照顧的原則。即由公社統一制定方案，在生活福利方面即供給部分全社統一标准；工資部分則参照各大队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高低有所不同。其中工資标准和等級也由公社

統一規定，工資級別共分十一級（1—11級），最低一級每个劳动力每月3元，最高11級，每月16元，各級有一定等差，只是各大队的平均工資和等級安排不同。如最低的队平均工資每月每个劳动力4.5元，等級安排1—6級；最高的队則有12.5元，从4—11級。三元里公社采取“既統又分、适当照顧，承認差別，又縮少差別”的做法，是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符合当前生产发展和群众觉悟水平的，可以使原有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区也能适当增加收入，以保證30%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如果不由公社統一分配，仍然由各小社自行分配的話，就不能体现人民公社的“大”和“公”的特点，不能發揮公社的优越性。若是采取平均分配“拉平”的話，原来生活水平高的小社社員意見就很多，因而也是行不通的，不利于搞好团結和发展生产的。下面的材料表明了目前三元里公社处理这个問題的結果：

长新队和远景队生产生活增长对比每人每年平均的产值收入如下：

	1957年	1958年	1957年每人每月平均收入	成立公社后的生活水平	增长%
长新队	85.2元	113元	4元	8.29元	107%
远景队	210元	273元	10.83元	13.7元	26.5%
比差%			1:2.7	1:1.5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据目前公社的分配制度，原来生活水平較低的长新大队（在15个大队中排列第12位），已經增长一倍多了，地区差別大大縮小了（由相差2.7倍縮为1.5倍）。如果要使各地区之間的生活水平达到平衡，采取“由低就高”的办法，公社还需要拿出大笔的資金来增加消費部分，必然影响公社今年生产計劃的实现；采取“由高就低”拉平的办法，原来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区将会有更多的社員减少收入，这既不符合社員的生活水平应根据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的原則，也不利于搞好社員之間的团結。地区差別問題是必須而且也不用很長的时间就可以解决的，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在普遍增加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低者多增，高者少增的途径来实现。根本的办法則在于发展生产。这样处理并不是对资产階級法权残余妥协，而是为今后的統一分配和消灭地区差別积极做好准备，是为了搞好社員之間的团結，为了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当然，处理这个問題必須同时对社員加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1959年2月5日）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我国教育科学的重大贡献

张其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所作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指南，对我国今后教育事业的继续跃进和改革，普及和提高，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特别是关于教育的党性问题。本文试就教育的党性问题，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指示”一开始在指出了教育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后，接着就高度概括地总结了解放后九年来我国教育实践的丰富经验，指出了教育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一些错误。这些成绩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中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可以清楚地看出：“指示”所指出的这些成绩，都不外是在党的领导下使教育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具体表现；而所指出的错误，又正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离开了这些原则，有碍于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由此可见，党在总结九年来教育工作，在肯定成绩和指出错误时，正是以“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必须

由党来领导”这些党性原则来作为检查和总结的根据和标准的。那个地区的教育办得好不好，那个学校办得好不好，都要首先根据这些观点和原则来加以考察、衡量和评价。对过去几年的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成果是这样看，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实践和发展方向，也必须这样看。

“指示”中所肯定的教育工作的巨大成绩和它所指出的工作上的一些错误，正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是大量现象的综合、概括。九年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绩和一些错误，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由于那些成绩和错误有着普遍性，一般地符合于各个地方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经验和教训同样有着普遍性，值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普遍重视，认真吸取。应该知道，我们对教育工作的考察和评价，必须从实际出发，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样的方针和原则来作标准。这就是教育的党性原则，或者说教育的阶级性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

教育有没有阶级性？教育学是不是党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认为教育没有阶级性，教育是超政治、超阶级的，当然也认为教育不是党性的科学。这是资产阶级“教育学家”和我们在教育思想、观点上根本分歧的主要之点。我们党是象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教育主张，鲜明而强烈地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强调必须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作为党性科学的教育学必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问题不在于对教育学作个什么定义，作何解释，而在于对“教育到底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作何主张，打什么旗号。资产阶级教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总是闪闪烁烁，不敢摆出他们使教育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主张，也不敢承认他们的教育工作彻头

彻尾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事实。他们不得不自欺欺人地说：“教育除本身外并没有什么目的。”（杜威：“民主主义教育”商务印书馆版）

要研究和编写中国的教育学的話，我們應該把教育有沒有級階性，教育究竟為誰服務，教育學是不是党性科學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同資產階級教育學切實較量較量，那末，我們必須認真深入學習“指示”中的明確而有力的階級觀點。

作為党性科學的教育學理論，必須同政治上經濟上的現實鬥爭、同黨的總路線密切聯繫起來。

“指示”根據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決議的精神，指明了“正確地領導教育工作，堅持黨的教育工作的方針，反對右傾思想和教條主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培養出一支數以千萬計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巨大的歷史任務之一。”對於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來說，教育工作是個“配角”，但又是個很重要的“配角”。正如劉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所說：“文化教育事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想使教育工作發揮它應有的重大作用，就必須使教育不是抽象地為無產階級服務，而是具體地緊緊同現實鬥爭聯繫起來。劉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報告中就這樣指出：“……對於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工作人員，應當着重地教育他們堅決聯繫實際、聯繫生產、聯繫群眾的方針，以便有效地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服務。”從“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我們可以体会到，它的全部內容貫串着“聯繫實際，聯繫生產、聯繫群眾”的精神，全部着眼點在於“有效地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服務。”所以說，運用強烈的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是党性科學的教育學理論的特徵，是資產階級教育學決不能有的。

“指示”強調在教育工作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它充滿了戰鬥性。這同樣是作為党性科學的教育學所必須具備的特徵。無產階級雖然成了國家的社會的主人，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雖然已經逐步建立起來，而教育上的階級鬥爭才是真正的開始。這個鬥爭首先表現在某些教師們對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的教育方針的態度上面。這種情況在去年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所揭露的在教育戰綫上的問題，足以說明。什麼“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黨不能領導教育”；“專家才能办好教育”；“共產黨办教育是運動式的教育”；“只有

讀書才是學習，才是求知識，搞政治搞生產勢必降低學習質量”等等論調，都無非是教育戰綫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抗拒黨的教育方針的表現，也就是列寧所說的“舊的資產階級偏見”。現在，經過了這一場偉大的政治戰綫與思想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偏見雖然比前大為克服，但仍有一定影響。所以“指示”有的放矢地說：“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的工农勞動群眾和廣大的知識分子，同‘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和‘教育只能由專家來領導’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這是實際鬥爭也是理論鬥爭，我們的教育科學研究應該注意充分地反映這個鬥爭，指導這個鬥爭，這是教育科學理論工作的任務。黨和政府的“指示”對於這鬥爭給予我們理論指導和思想武器，我們應該很好的掌握，很好的運用，用以解決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問題。

總之，明確的階級觀點、堅定的群眾觀點、和強烈的戰鬥的精神，是作為党性科學的教育學理論的主要特徵，這一“指示”都給我們提供了典範。

“指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及其教育學說，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及教育工作的具體情況、存在問題，作了綱領性的規定。這些規定又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學說。毛主席早在1938年教導全黨同志說：“不但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就是這樣謹慎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掌握馬克思、列寧的教育學說，深刻地考察當前我國教育問題從而正確地解決了問題。

“指示”非常明確地規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性質和任務的闡述，我們可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看到和“指示”相一致的观点，例如列寧在許多場合都反復強調文化教育必然為階級鬥爭服務，他說：“我們說，我們的學校同樣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鬥爭。我們公開聲明，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引自列寧全集第廿八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也不止一次地提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現在，我們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家的教育理想變成現實，把他們的教育學說和觀點更

完整地发展起来，制訂成为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針，变成行动的指導力量。

其实，我們党和毛主席早在1934年对于中华苏維埃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方針作了大体上的論述：

“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引自：“毛澤东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言論”——广东省教育学教师学习会翻印本）可见党是一貫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现在，“指示”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作了确切的规定：“在一切学校中，必須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課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农场和合作社办学校。”“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把学校所办的工厂和农场，納入地方的生产計划和商业銷售計划……”所有这些，都是保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有效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学校教育更加趋向社会化，十分有利于克服“关門办学”的傾向。“指示”在规定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重大措施的时候，首先根据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的观点，更完整地指出：“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須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別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的共产主义服务。”这里可以看到，党的教育工作方針不仅为了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建設，更远大地为了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逐漸創設精神方面的条件，并有力地帮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指示”又根据馬克思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手段，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这一观点，更加明了地給“全面发展”的涵义作了正确解释，并且肯定：“只要领导得好，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学生來說，不論在德育、智育或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途径。”在我們的教师中有不少人由于不容易摆脱资产阶级教育观点的影响，对“全面发展”常常曲解或誤解为仅仅是书本知識的“全面发展”。或者陷于某种模糊观念的爭辯。“指示”澄清了多年来对于“全面发展教育”在理解上和实践上

的混乱思想。它說：“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义。”还把这一口号指明为“教育的目的。”那就十分明白，遵循着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針，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从而必然地逐步地达到使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的。

教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教育問題的最根本的問題。但是，在我們許多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人，常常忽略这个問題，甚至在某些教育学著作或講授教育学的教师中也并不十分重视它。馬卡連柯曾經尖銳地指謫过这种不应有的现象。他說：“在教育學理論中，最可怪的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几乎变成被遺忘了的范畴。在最近召开的全俄罗斯教育科学會議上，对于教育目的却一字不提。好象科学的教育学与这問題无关似的。”（引自：馬卡連柯全集，中文版第五卷）我們有必要認真把“指示”中有关教育的目的这一問題的看来似乎很簡單的論述加以鈎研。

“指示”还根据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需要，也根据馬克思和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必須再教育的观点，把学校教育推广成为全民教育，把学校分成三个类型，从而非常有利于“工农群众知識化，知識分子工农化”，尽快尽好地实现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宁曾在俄共（布）党綱草案上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則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組織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半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引自：列宁全集第廿九卷）我国工农业余教育已經有了很大发展，根据“指示”的精神，今后工农教育势必繼續大大发展大大提高。人們常把“教育”的概念局限于普通教育来理解，就是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也通常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儿童教育、普通教育方面。“指示”指出了今后我国的教育方向：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农场合作社（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制度已經逐步推广。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迅速开展以来，工农商学兵一体，使全国教育处在一个极其伟大的变化发展中。就是普通学校也正在广泛地进行教学改革，在在显示着这一“指示”的巨大威力。这体现着党的总路綫和教育方針的胜利，也体现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學說的胜利。

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与实用主义反动教育观点的根本区别

李共水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一条与资本主义教育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

这个教育方針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論而提出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論的中国化，是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論和中国教育实践統一的結晶。

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要求人的全面发展。什么是全面发展呢？馬克思主义教育家认为：全面发展最本質的問題就是既有实际斗争經驗（包括階級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經驗），又有理論知識；“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紅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化的工人。”^①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党所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唯一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产生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的方法。”^②“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的社会是不能想象的；我們不可能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现状所要求的那种高度。”^③只有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才能更快的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才能最后摆脱貧困与愚昧状态，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

民的剥削階級思想及其残余才能最后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別才能逐步縮小以至最后消失。

实践証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办法。首先，在德育方面：过去不少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剥削階級錯誤思想在青年学生的头脑中还严重存在着，因而輕視体力劳动、輕視劳动人民。可是学生通过劳动鍛炼后，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和鍛炼，大大改变了学生中輕視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的傾向，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新的道德品質正在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有了提高。其次，在智育方面：过去的青年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学得的书本知識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問題。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后，他們的书本知識就能够从实践中得到印証，把理論和实际結合起来；同时使学生获得从事工业生产或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除此之外，还可以使他們在劳动实践中学到从书本中所学不到的新的实际知識，丰富了生活內容，扩大了知識領域。第三，在体育方面：过去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知識分子，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可是通过劳动鍛炼以后，大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学生的发病率逐步下降。总之，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結合，提高了教育质量。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指出的那样：“……事实証明，

① 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②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一卷，第591頁。

③ 列宁：“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轉引自“教育譯报”1956年第6期第6頁。

只要领导得好，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来说，不论在德育、智育或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

现在，党的这个正确的教育方针，对我国的教育事业的改造和新的跃进，正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学习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特别是怎样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这一教育方针，这是当前教育理论中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仅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与实用主义反动教育观点的根本区别问题，加以论述，并着重批判那种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同实用主义者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反动观点混淆起来，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打乱了科学性系统性”等错误看法。

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点不仅有区别，而且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

我们知道，实用主义教育学产生与发展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这时正是美国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支配下，它的一切矛盾，首先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极度的尖锐化起来。而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动使命就在于幻想利用教育来消除这些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意识，缓和阶级斗争，用教育来代替革命，这样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头子杜威在他1916年所著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就说过：“消灭国家的目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目的之间的矛盾，这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中乃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美国的反动统治集团则认为杜威是把西方“文明”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中挽救出来的精神上的救星和保卫者。这就不难理解，实用主义教育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死敌。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教育，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的教育是消灭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工具；它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及差别服务，它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这是我们的教育方针与实用主义教育观点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

实用主义教育学是建筑在反动的主观唯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者自称他们是彻底的经验论者，它的论点即是以主观的经验来否定

和代替客观的存在，认为“存在即被经验”。实用主义者由他们的“经验”出发，标榜重视实践。但它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类的生产活动来谈实践的。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文化腐朽的产物，它是帝国主义的哲学。而实用主义教育学就是建筑在这种反动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杜威宣称他的教育哲学是“以经验为内容，经由经验来进行，是为经验的目的而进行的教育”。

由于实用主义教育学建筑在经验论基础之上，他们从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出发，于是提出“学校即生活”、“从做中学”等口号。实用主义者杜威，这个反动透顶的美国教育家认为学校不是使年青一代进入生活的准备阶段，而是学校即生活；这种学校和生活的联系在于：儿童在学校中的学习不应当是一个为了他们的未来的劳动活动而获取知识的过程，而应当是劳动过程的本身，应当是成年的人们所实行着的那种劳动过程。实用主义者把学校教育和教学的重心集中在学生的活动上，儿童们能够象在校外和家庭一样，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因此，实用主义者主张学生应“从做中学”，即从儿童自身的活动中来学，从儿童的经验中学；从儿童自身活动中获得经验。也就是说学校一切措施，都应该以“做”为中心，课程是依照“做”来安排的，教学是从“做”中去进行的。“做”什么？根据什么来“做”呢？根据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兴趣、儿童的经验。于是杜威又提出“儿童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儿童是太阳，教育工作应围绕着他转动，认为教育应以儿童的经验为中心；教育的内容、计划、方法和教师的全部教育活动都应当服从儿童的兴趣、经验和需要。所以不可能有预先拟定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同时，杜威力图证明，学科内容是不能预先决定的，否则便会压抑儿童的兴趣和才能。

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它们的教学方法，就是所谓设计教学法和围绕一个学生偶发的兴趣布置一切教学活动的单元活动。只要举出两个逗人发笑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是一种如何荒谬的教学方法：一个初级小学四年级学生，想买一瓶墨水，觉得到校外购买不方便，因此，提议学校里开个贩卖部。这个学生对贩卖部的兴趣，引起了其他学生的同样兴趣，于是从开始筹备到成立贩卖部，成为一个学期学习的全部内容。一个小学的六年级有一个同学死了，于是设计一个大单元，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开追悼会。因此，图画课练习画死者象，读法课读祭文，缀法课练习写祭文，书法课写挽联，唱

歌課唱輓歌，手工課做追悼會用的礼堂陳列品。總之，一切圍繞着開追悼會。^①

實用主義教育學的這種“學校即生活”、“從做中學”的觀點，雖然從字面上看似乎也很重視聯繫實際，把學校與生活聯繫起來。但是，只要不從字面而是從實質上加以解剖，就不難看出這種教育觀點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可惜有些人却被它的狡猾性與隱蔽性所迷惑，以至錯誤地把這種反動的反科學的教育觀點，與我們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混淆起來。

其實，實用主義者的所謂“在做中學”處處注意“實踐”，這種“實踐”不是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實踐，而是取得狹隘的尋常經驗的“實踐”，因為它是離開人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來談實踐的。他們認為實踐可以離開理論，由人們摸索前進。“從做中學”由做中得出理論，但它的“做”，不是社會實踐，也不是生產活動，而是遊戲、手工或在森林中尋找迷路。所以實用主義者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它不是引導學生去認識世界，更不是引導學生去改造世界。杜威之所以力圖通過學校去限制學生的知識水平，正是為了阻止勞動人民的子女獲得科學知識，使他們孤陋寡聞，禁錮學生的思維活動，以便使他們永遠愚昧無知、鼠目寸光，永遠受統治階級的剝削，以符合那些無止境地追求利潤的壟斷資本家的願望。這便是實用主義教育學的反動實質。因此，實用主義者強調“從做中學”、以“做”為中心，是有其階級根源的。列寧在指出資產階級學校的特征時曾經寫道：“在這樣的學校里，工农青年所受到的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為迎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為資產階級造成適用的奴仆，他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②顯而易見，實用主義的“學校即生活”、“在做中學”的反動的教育觀點，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我們主張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學生一面讀書、一面勞動，把學校里所學得的書本知識同生產實際結合起來。因為我們學理論、讀書本，就是用最經濟的辦法將前人的東西吸取過來（這是一種間接經驗），然後我們再通過自己的勞動實踐（直接經驗）加以印證、檢驗、發展和豐富它，這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也是在學校里學習的正確途徑。實踐固然是知識的源泉和理論的基礎，但每一個人認識客觀世界或積累知識時，不單靠直接經驗。所以，我們貫徹黨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要學生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學會某種生產

知識和技能，但我們從來沒有忽視向學生傳授系統的科學理論知識；即既強調實踐（包括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踐），又重視系統的理論知識的學習，使學生獲得比較完全的（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相結合的）知識，同時又是比較廣博的知識，培養他們成為多面手。我們一面規定：“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依照規定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見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一面又指出：“不能因為勞動而忽視基礎課，忽視理論就如列寧說的，僅僅是把一個大學變成簡單的工徒學校，我們是不贊成的。”（康生同志視察安徽教育工作時講話，見1958年12月1日文匯報）“在缺乏勞動的學校里強調勞動，在缺乏基礎課程的學校里強調基礎課程，使兩種學校都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發展，逐步向理論與實際的更完善的結合前進。”（見“教育工作指示”）可見，我們是既強調勞動實踐，又重視基礎課程，保證學生在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同時，能從事一定的生產勞動，使二者結合起來，互相滲透、互相促進，成為新的化合物。同時，我們的勤工儉學決不是盲目地進行，也不是單純的根據學生的興趣、經驗和需要，而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實施的。因此，我們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結果，就既能使學生獲得系統的文化科學知識，又能使他們獲得從事工農業生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從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真才實學，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眼光遠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型勞動者。難道這裡和實用主義者的觀點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我們要求學生在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同時，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但我們不主張“勞動是整個學校工作的中心。”因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一種新的教育，同光教育不勞動有質的差別；這也是一種新的勞動，同光勞動不教育有質的差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是混合，也不是加法，而應當是化合，正象氯加鈉不是氯鈉的混合，而是成為一個新的化合物——鹽，這樣才能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陸定一同志在西安視察時的指示，見1958年12月7日

① 引自“杜威教育學批判”，B.C.奈夫金著、馮可大等譯，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頁。

②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頁。

文汇报)而且,我們认为,普通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儿童,他們在学习期間,主要是学习文化科学基础知識和政治,所以,普通学校应该以教育教学工作为主;但为了使他们从小养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促进身心发育,更好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識,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就必須同时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合理的安排时间,做到学习和生产劳动两不误。同时普通学校的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而不是离开教育,为劳动而劳动。我們还要求生产劳动“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結合。”(见“教育工作指示”)教材內容要結合实际、生产,但一定要提高基础知識的质量,要照顧到今天,又要照顧到明天,我們反对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操作內容为綱来編选教材。因为这样会使学生得不到完整的体系知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由此可见,我們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是服务于党的教育方針,服务于培养新型劳动者的目的。

我們实行勤工俭学以后,并没有降低教学計划、教学大綱和教科书的作用。我們认为,必須根据党的教育方針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当然还要照顧儿童的年齡特征),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計划、大綱与教材。“教学計划、大綱、教材是进行教学的行动綱領,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如果没有一套体现党的教育方針的、没有一套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識方面符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需要和符合于我国实际的教学計划、大綱、教材,就不能实现对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实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結合。因此,教学計划、大綱、教材的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社論:“根据党的教育方針来改革教材”)目前我国各級各类学校都在根据党的教育方針着手修改教学計划、大綱和教材,使我国的教育更能适应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同时,我們进行教材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文化科学基础知識,相反的,还补充了很多符合党的教育方針和生产大跃进需要的教材,使教学內容相应的得到提高。

我們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們又对不同階級出身的儿童进行不同的教育(但不是唯成分論),同时对各个不同

年齡阶段的儿童以及学生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即针对儿童的实际情况施行教育,“把‘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結合起来。”(见“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所以,我們不象实用主义者那样单纯強調学生的兴趣、經驗和需要。此外,实用主义者认为教师只能跟着学生跑,把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处于配角地位。而我們却恰恰相反,我們认为,教师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与学生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难道这里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嗎?

所以,我們不能仅从形式上去作类比,而必須从本质上去区分我們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同实用主义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的根本不同。陆定一同志在江苏农业中学座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同志說什么单軌制是无产阶级的,双軌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凡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培养学生的,不論是单軌制或是双軌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里告訴我們,必須从內容和实质上来理解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認識党的教育方針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同时正确認識实用主义教育观点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①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必定要为一定政治經濟服务。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們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所以,教育必須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实现工农群众知識化、知識分子工农化,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設事业,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所以,我們决不允許把我們的教育方針与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混为一談;必須在教育界进一步清除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明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的意义,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地貫徹与执行党的教育方針。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657頁。

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

——东莞劳动百日的收获

中共中山大学历史系总支委员会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工同学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山大学历史系三百七十多位师生，坚决响应党委的号召，于1958年10月10日到东莞县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至1958年1月17日回校为止共三个月另七天。第一阶段两个月，以劳动锻炼为主，第二阶段一个月以教学改革为主，劳动为辅。三个多月来，我们在人民公社运动的大熔炉里进行劳动锻炼，获得了德、智、体的全面大丰收，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完全正确。

在农村的三个多月，特别是第一阶段的两个月，我们提出了“以劳动为纲”，“一切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口号，并以劳动来结合与带动一系列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我系378位教工同学在1958年10月11日至12月10日的六十天内，共劳动了廿二万个小时，以8小时为一个劳动日计算，共27,500个劳动日，平均每人每天劳动十小时又廿分钟。在秋收工作全面开展时，总支为适应秋收高潮形势，提出了“全力以赴”的口号，师生们搬到了田头，劳动时间每天16小时以上，甚至连续两天两夜，通宵达旦，拼命苦干。我们参加了插秧（迟插）、车水、收割黄麻、防倒伏、种菜、秋收、深耕、冬种、积肥、修水利、炼铁、炼钢、烧炭、烧砖等等近廿项不同工种的生产劳动，基本上掌握了上述各项生产技术，进行了多项工具改革。以劳动为纲带动了其他工作，出色地表现在“把文化带到农村”这一工作上。我们坚持了宣传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原则，结合人民公社运动和生产劳动，仅在第一阶段的两个月的统计，我们帮助各地各级领导办了“附城快报”、“火箭报”、“红专快报”、“跃进报”、“战地快报”、“石龙红专”、“常平通讯”、“钢铁先锋”和“深翻捷报”等等廿多种刊物，共出版了214期；开办了党校、团校、红专学

校、业余中学、训练班等学校共25所；帮助农民建立了三百多个民歌坛，写了标语二万三千多张，漫画二千三百多张，墙头诗画五百多幅；进行了二百七十多次演出；协助农民成立了宣传委员会、体育协会、战地文工团和召开运动会等等。此外，我们还和农民一道在田头或在田间劳动生产休息时间进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哲学等讲课一百廿二次。至于在田间读报、教歌、教舞、教普通话、表演文娱节目等，则更难以统计。这些工作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文化宣传工作的开展，使苦战变成了乐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我们在劳动锻炼的同时，还进行了人民公社问题和历史调查研究、各种访问、田头座谈会、农村情况调查以及革命文物的收集等工作与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第二阶段的一个月期间，除以一定的时间参加劳动以外，都集中力量进行教学改革。揭发教学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大字报有3,000多张，先后举行批判会数十次，无论从师生们的决心或揭发批判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均比以前要彻底得多。

以上是我们在东莞劳动三个多月的基本情况及所完成的工作。在进行劳动锻炼和参加各种实际工作中，使我们在向又红又专的前进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为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打下了基础。初步总结，我们在下列四个方面，得到了丰富的收获：

（一），通过劳动锻炼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

下乡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师生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方面，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表现在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上。

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与资产阶级的劳动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前者要求人们要有“我为人人”的思

想，各尽所能完全自觉地积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生产斗争中必然起着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而后者却是“拿一分錢，做一分工”买卖式的、消极的劳动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必然对生产起着促退作用。下乡以前，大多数教工同学在劳动中、在工作中还没有确立正确的劳动态度，甚至或多或少地表现雇佣观点和采取消极态度，然而，在农村的三个月中，由于农民冲天干劲和拼命苦战的精神教育了我们，也由于我们反复强调了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意义，并在劳动及务虚中努力贯彻，因此，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在我们全系师生的思想中已不同程度的树立起来了。这表现在下乡劳动时能自觉地拼命苦干，意志顽强。在大宝山伐木烧炭的四年级廿多位男女同学，在渺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中餐风露宿，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光着脚踏着碎石和蒺藜砍伐树木。人滑到山坡下去了，爬起来扛起木头又高歌前进。这样苦战了八昼夜，超额完成了120吨木炭的艰巨任务。秋收，这是最艰苦的一关。师生们和农民一起拼命苦战。有的同学发高热至39度仍舍不得离开集体，刈稻子刈得蹲不下去、挺不直腰，就跪着、坐着、爬着干。甚至晕倒在田中，休息一下又投入了战斗。二年级乙班有80%的同学刈伤了手，一年级丙班第三组除病员外，剩下的四个同志提出“一人当三人，要完成全组任务”，向农民挑战，苦战一昼夜，取得四个人刈六亩多的战绩，震动了温塘营。教师们也在劳动中也表现出了冲天的干劲，与同学打成一片，大大密切了师生关系。

但这种艰苦劳动的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相反，有人强调自己的困难，耽心搞垮自己的身体，怕艰苦等思想还是存在的，只是经过热火朝天的农村战斗洗礼，才由被动到主动，自觉地劳动，最后甚至争取参加最艰苦的劳动。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树立这种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但又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从旧社会中出来，受旧社会的影响还深。下乡前，师生们轻视体力劳动、高农民一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普遍存在；大学教授、大学生与农民平等，师生平等的思想，都还未有很好的解决。红专辩论时，对“大学生当一辈子农民是浪费”、“农民干部什么也不懂”等思想进行过批判，但不少人还是口服心不服。党总支针对这一问题，一再强调要和农民“八同”，在一切生活和劳动中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经过三个月的劳动锻炼，全系师生亲尝了劳动的艰

苦，因而亲切地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实意义。在与农民一同劳动一同生活的经常接触过程中，较彻底地克服了轻视农民、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真正感到未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的特殊感、优越感，从而能够比较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和农民平等的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树立起来了。正由于这样，所以绝大部分教工同学都能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在各种劳动战线上，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与致全力于搞好生产，以至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劳动。如三年级同学在炼铁中改造的手摇鼓风机和深耕中改进的绳索牵引机均使效率提高一倍。在石龙的钢铁厂炼钢铁的同学创造了该厂搓煤球的最高纪录，夺得了“中山大学上游排”的光荣称号等等。这样，使过去“五谷不分”的人，也居然写起了“略论工具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大头菜种植和腌制”和“卷心白菜的丰产经验”等文章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转变。至此，“大学生一辈子当农民是浪费”、“农村干部什么也不懂”等谬论，也不攻自破了。曾经认为大学生当农民是浪费的同学都深深感到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感到不仅不是浪费，而是自己当一个农民还不够“格”，因为自己懂的知識实在太少了，认为农村干部什么也不懂的同学也说：“我错了，农民干部水平很高，分析问题头头是道，很有说服力，如果我们的教授能讲得农民这样好，那就太好啦……”。

“和农民打成一片”，“向农民学习”，现在喊起这些口号来就感到有血有肉，真实亲切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农民的教育与影响，师生的平等关系，在教师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来了。师生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务虚同评比中，互相了解，互相帮助，新型的同志式的师生关系也逐渐成长起来了。

（二）与劳动农民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培养工农感情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缺乏工农感情，就说明立场尚未根本转变。立场不改变，当然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能贯彻我们党的教育方针。这次下乡劳动锻炼，就是要使全体师生培养起工农的感情，改变阶级立场。

初到东莞，农民热情迎接我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用生疏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他们不肯给重活我们干，吃的、住的样样照顾，客客气气，群众还没有把我们看作是他们的人，然而通过艰苦劳

动的锻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我们的劳动态度、生活作风、思想感情也慢慢地改变了，与农民群众打成了一片，最后建立起亲切的关系，农民也就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越来越多地帮助与教导，这也大大促进了我们自己的变化。

下乡前在一些教工同学心目中，农民是粗笨、头脑简单、没有礼貌、无感情、不讲卫生、自私、落后、保守、散漫……，有些人也知道今天的农民比以前已大有改变，但没有亲身接触还总是不大相信。这次与农民日夜接触，才认识到生活本身，有力地驳斥了上述的错误看法。在生产中农民的勤劳勇敢和冲天干劲，在斗争坏分子会上及辩论会上农民立场的坚定，在大兵团作战中的坚决服从调动，坚决执行党的一切决议等等一系列的生动事实，自发教育了那些对农民有着错误看法的教师和同学，什么保守、落后、自私、散漫、头脑简单等论调，都不攻自破了。

对农民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生活上、作风上，就能比较自然地表现出与农民的一致。正如到箕村参观的解放军某部的政委说的：“我以前对大学生的印象是：头发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讲究，走起路来也有着大学生的样子，还不容易接近。这次我下来一看，完全不是这样。听说这里住了几百位大学生，可是一个也没见到，因为你们在田头和农民一样劳动，穿一样的衣服，到底谁是大学生，谁是农民，根本就分不清楚。”

我们和农民打成一片以后，农民便把我们当作知心的朋友，甚至当作是自己家庭成员之一。当我们有的同志病了，他们就偷偷地去请医生、煎药，和悄悄地把猪肝鸡蛋放在稀饭里；当劳动损伤手脚时，毫不犹豫地撕下自己的衣服为我们包扎伤口，……这种真挚的阶级感情的表现，使那些曾认为农民是无感情冷冰冰的人也自愧不如。思想感情的转变，使我们特别热爱农民。有一位同学听到中文系某教授说农民的坏话以后，愤慨极了，他说：“我听到有人说一句农民的坏话，就象自己的父母被人无辜打了一记耳光一样难受”，并连夜写了七千多字充满了阶级感情的文章予以批驳。就这样，我们坚决地主动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使农民更加了解了我们。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农民写了很多赞扬这种友谊的民歌。箕村有一位排长冯景南写道：“箕村来了大学生，社员劲头翻一翻，大家一起同劳动，不分农民与学生。我们向他学文化，他们学我把田耕。晚间上课当教师，白天生产当学生，个个不怕苦和累，决心锻炼红与专。能文能武

是好汉，我们时刻记心间。”当我们一部分师生离开原住的村子到箕村集中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东莞回校的时候，农民所表现出的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景实在动人。他们开欢送会，送礼物，送锦旗，写告别信，甚至从数十里外赶来送行，抢着代挑行李送至码头，千叮万嘱要互相通讯。临别时，一位营教导员给同学的赠言中说：“几个月的劳动相处，我看出你们是我们的人！”这是一句最美的赠言，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与农民的阶级感情的建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一，思想感情的开始变化，就表明立场观点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转变。这是根本改变我们原来阶级立场的良好开端，它说明了我们已开始抛弃那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错误观点，开始树立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为根本改变原阶级立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工农感情的建立，是今后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根本前提。如果自己没有工农的思想感情，就不会热爱工农，不能为工农设想，从而无法好好为工农服务。因为根本不了解工农的人，又怎能为工农服务呢？第三，对今后更好地向劳动人民学习，贯彻自觉的不断革命有着重大意义。工农感情的建立，就说明我们开始解了农民，因而感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样就能更好地向农民学习，促进自我革命，又能更好地向劳动人民学到更多的东西，思想觉悟就能更快的提高，加速解决立场问题。

（三）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应该成为又红又专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党的领导当促进派。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我们亲身参加了农村的生产斗争以后，真正认识到全部历史都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投身于这种斗争，参加创造历史，如不与创造历史的劳动者相结合，如不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必将歪曲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前进。同志们明确了政治方向以后，要求入党的人数达107人，占全系总人数28%，要求入团的达43人，占适龄青年77.2%。同时人人力争上游，当促进派。最近一次评比，评出上游256人，占总人数76.6%。其次，明确了自己应该成为一个集体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普通劳动者。在农村的三个月劳动，使我们非常具体生动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集体的事业，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个人力量的渺小。秋收深翻的大兵团作战和整个大跃进形

势，都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及的，从而检查到过去坐在书房里妄自尊大，坐井观天，是异常可笑的；体会到个人的力量只有融化在集体之中，才能起作用，同时，又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出现在集体之中才能发出光和热。三个月来同志们向着这个方向作了努力，收到一定的效果。过去迷恋于想当“专家”的同学，清算了个人主义，觉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最光荣，愿意永远留在农村当个普通的农民”。再次，我们还明确了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能文能武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者。我们并不反对读书，问题是如何去读。列宁说过：“旧时的学校是崇尚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闭塞着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些依法泡制的官吏。”我们这次元旦献礼，写了二千多篇文章，都是联系实际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劳动实践，是无法在短短七天中写出等于过去几年的东西来。

（四）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提高了教育质量。

三个月来，在师生们的阶级立场受到了很大锻炼的同时，也摸索了一条历史科学为现实服务的途径。实践证明，只有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才能克服理论脱离实践，才能克服研究历史的人脱离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的倾向，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历史科学的水平。由于我们亲身参加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参加了人民公社运动这一伟大历史变革，大大地锻炼了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由于我们与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参与了实际斗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认识到反动阶级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使我们在活生生的现实课堂上学习了阶级分析法。这一切又使我们更进一步生动而又具体地认识了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认识了厚今薄古的正确和它的生命力；在劳动中我们还发现了现实斗争的生活是有着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丰富的有用史料。这就更巩固了我们的专业思想。因此，师生们在参加劳动的同时，结合农村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展开了调查研究工作的活动，根据平时积累的資料，在元旦献礼的短短七天中写出了論文2,156篇，410万字。其中结合专业的历史著作329篇，百余万字，如长达四十三万字的东莞县志，十三万字的“篁村史”，六万余字的“温塘志”，“亨美人民翻身史”以及“常平公社

史”“常平钢铁厂简史”“东坑人民革命斗争史”“水蛇涌今昔”等等。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去年国庆献礼时的成绩。这些文章最明显的特点是沒有干巴巴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与颂扬，充满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歌颂，充满着强烈的阶级性和战斗性。

在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还集中表现在这次教学改革上。在农村时进行鸣放、辩论和教学检查与思想批判这个阶段，大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批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严重错误倾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由于有了第一次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师生们通过劳动锻炼以及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大辩论，认识大大提高。又由于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并始终贯彻了自觉革命与群众检查相结合、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使得运动始终健康发展，师生情绪高涨。许多教师由于认识了大破大立的必要性，并基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自觉革命的决心很大。如刘节教授就首先带头贴出大字报，要求在全系大会上，自我检查，自我批判，而在自我检查时对抛弃唯心主义，学习并运用马列主义有较大决心，系内很多师生都表示欢迎刘先生的这种进步。在经过劳动锻炼的思想基础上，在农村期间进行的教学改革，解决了过去中大历史系一向未能很好解决或解决得还不够深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明确了历史系和专业的方向，应该是近代现代史的研究，而以华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革命斗争历史为重点。进一步更深透地检查、揭发和批判了系内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最后还为三结合作了良好的开端，因为在劳动锻炼中已经密切了师生关系，通过这次教学改革的自我检查及群众批判，使师生关系更为密切，而且统一了认识。在统一了认识 and 思想的基础上，集体力量更能发挥。目前全体师生运用三结合的方法正在张紧地信心百倍地编写七门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数达三百万字以上的讲义。

所有以上这些成绩，都与下乡进行劳动锻炼分不开，这充分地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与胜利。当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可能在三个月的劳动锻炼中就全部地解决了问题。我们认为，这些成绩，还只是为我们全系师生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后仍须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笔談次序按姓氏笔划排列)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的初步經驗

暨南大学副校长 王 越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怎样贯彻这条方针，各学校都在探索，有些学校已经总结出一些经验，这里简单介绍我校的初步经验，以供参考和讨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者是统一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必然反对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必然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人，认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学不到什么东西”，“浪费青春”“不象大学生的样子”“降低质量”，甚至说“劳动会搞垮身体”，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反映了“劳心”要与“劳力”分家的主张，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他们实质上是反对培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人。

我们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和实践的效果中，看出反对派的主张是错误的。华南新办的暨南大学只有一年级生，开学初期，师生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尚未上基础课，大部分师生按专业的性质下乡、下厂、下海，锻炼了一个多月至三个多月。总结这个时期的工作，大家体会到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正确的。

以水产系下放到广东北海参加生产劳动为例，该系养殖专业的一班，在系的党组织领导下，在北海南湾的主要生产劳动为挖鱼塘和养珍珠，在未进行生产劳动以前，先受过一星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又由教师讲了三天课，内容有海洋的一般知识、浅海养殖的介绍，海边动物的采集法和制作法，讲的东西太多，同学们又还没有接触过生产实际，形象教学的材料也没有，因此，同学反映，模糊难记。后来，同学经过生产劳动，掌握了一些实际的生产

经验，再由教师详细讲授珍珠养殖法，同学反映容易了解，体会很深。教师又对贝类养殖的饲料——浮游生物作过讲授，并进行观察。此外还请养殖海带的工人，作过海带养殖法的讲授。这些结合现场实物的教学方法收效很大。同学们还结合生产劳动进行了调查研究、设计、实验、和制造机件，写出了报告或论文，经小组讨论后定期宣读。这对同学来说又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该班的做法说明(1)结合与专业有关的生产劳动进行教学，就能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收效很大。学生进行生产劳动以前，由教师或其他能者传授一些基本知识的做法也是好的；如该班在进行珍珠养殖的实践以前，曾请珍珠养殖场的技术人员，实地传授插核等养珠知识，这是必要的；但学院式的讲授，则不起作用。教师同学进行生产劳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后，就须总结提高，或者和已有的正确理论互相印证、充实、修改，或推翻原有的理论，这时教师的指导是需要的，联系实际的讲授是必要的。(2)结合与专业有关的生产劳动进行科学研究，这不特对于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帮助，而且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起很大的作用。同学们制造了插核机就有助于珍珠的养殖。(3)教育结合生产劳动又创造了党领导下，教师、学生、能者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开辟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途径，这也就是党领导下通过群众路线来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途径。(4)过去认为大学一年级生水平太低，不能搞科学研究，这是一种迷信。如果教育结合生产劳动，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们在党领导下，在教师指导下，发挥敢想敢干的精神，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这不特培养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和才能，锻炼了他们的意志，而且对教学和生产都能作出贡献。

我們在劳动鍛煉中获得了什么？

中山大学外語系教授 王多恩 桂燦昆

自从党中央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后，全国各个学校都大力貫徹。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是貫徹这一方針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中山大学外語系全体师生，于去年十月下放到东莞县麻冲人民公社。我們在两个多月的劳动鍛煉中，在和农民“五同”中，向农民学习了不少东西，鍛煉了階級立場，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干劲，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收获很大，仅下面的一些事例，就有力地証明党的教育方針的伟大正确。

我系师生，多数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而且多数长期住在城市，許多人对于农村和农业劳动是陌生的。下放前后，不少人害怕紧张的劳动，怕在农村营养不好搞垮身体，怕生病沒药医，尤其是对繁重的体力劳动，赤足下田，有抵触情緒。經過党的教育，特别是經過同农民一起共同劳动的实践，农民的冲天干劲，勤劳勇敢的高貴品質教育了我們，帮助我們消除各式各样的顧慮，开始建立了劳动观点，越来越多人赤足下田，爭着干繁重的劳动，并在劳动中增强了体質。

农民階級立場坚定，爱憎分明，对我們也有深刻的影响。下乡不久，我們参加对不法地主的斗争会，农民坚决对敌斗争的言行，同我們一些人在反右斗争中的温情主义、敌我不分是一个鮮明的对比。不少人面对农民坚定的階級立場，感到慚愧，感到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另一面，农民热爱党坚决拥护党的思想行动，也給我們深刻的教育。無論党布置什么工作，任务多繁重，农民都以愉快的心情，冲天的干劲去努力完成。当党号召大量积肥时，成千上万的农民，毫不犹豫地拆掉自己的坭墙房子，扩大肥源，这和一些知識分子，口里說拥护党，但当党的号召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那种心口不一的表现，又是一个鮮明的对照。經過这些和农民共同劳动共同斗争的切身经历，我們很多人提高了政治觉悟，鍛煉了階級立場。

下乡之前，“究竟农民有些什么值得我們学习？”的問題，曾經有不少人怀疑。經過生产劳动的实践后，我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弱点暴

露出来，許多农业生产知識一无所知，認識到这方面必須向农民学习。但是还有人认为理論知識总比农民学得多、学得好。到了和农民一起学习“矛盾論”时，这点也成了問題。因为农民学习理論，处处联系实际，講起理論，又非常生动活泼，头头是道，比起我們从前的夸夸其談的确要强得多，农民不仅在講理論时善于处处联系实际，而且善于运用理論来指导实践，来解决实际問題。不論是在深耕改土，秋收，以及布置每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时，都应用了矛盾論，解决了实际問題。

这些动人的事例使我們明确地体会到理論联系实际，理論指导实践的重要，再联系到我們过去的教学工作，無論在教学思想，教学內容，和教学方法上，我們是否做到理論联系实际？我們是教外国語言文学的，我們培养出的人材应当能够利用外国語言文学为无产階級的政治服务，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設服务，但在过去，我們选材、講授的指导思想都是厚古薄今，厚外輕中的，教材和講授的內容是十九世紀以前的作品多，现代的作品少，反映英美社会的多，反映我国社会、尤其是新社会的少。显然，我們过去的教学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

再想一想，农民为什么那样立場坚定，爱憎分明，干劲冲天？回答是：他們政治挂了帅。那末，在我們过去的教学中，政治是否挂了帅呢？無論在教学或科学研究中，我們都沒有注意到語言是工具，掌握在什么階級的手里就为什么階級服务，也沒有注意到文学是上层建筑，要为我們的經濟制度、为工农兵服务，因而在我們的外国文学課程中，就选了不少反映英美資产階級社会的作品而不加批判地教給学生，甚至在我們語法語言的教材中，也出現过很多宣传資产階級甚至封建迷信思想的例句和文章。这就說明我們过去的教学工作是脱离政治的，沒有貫徹政治挂帅。

在参加建立公社，大兵团作战的过程中，我們也深深地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群众智慧的无穷，个人力量的渺小，从而認識到过去“专家脱离群众”給教学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无数的損失。

总起来說，我們这次下乡参加劳动鍛炼的收获是很大的，我們当中絕大多数的人都树立了劳动观点，坚定了阶级立场，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检查了过去我們在教育中“四脱离”的现象，为我們的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乡归来，我們無論在編写教材，进行教学或科学研究中，都注意糾正过去“四脱离”的现象，坚决实行“三結合”（党，教师和学生三結合）。党的领导加强了，教师和同学的联系密切了，教学

質量提高了，科学研究的队伍壯大了，系里出現嶄新的气象。这就証实了党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的正确和伟大，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教导我們的：“知識分子若不与工农相結合，必将一事无成”这一句話的真理。然而，我們当中也有极少数的人，尽管也参加了劳动鍛炼，也看到了人民公社成立后大跃进的景象，但仍然“无动于衷”，这正說明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須与自觉革命相結合。

在干部学校中贯彻党的教育方針的体会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务长 古子坚

党的教育方針，是全国各类学校都必须坚决贯彻的方針。但各类干部学校如何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精神，結合自己的特点和要求，制定更为具体的教育方針，这是干部短期訓練学校必須解决的一个基本問題。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是高等学校类型的干部短期訓練学校，它的教育对象是在职的中等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县（市）教育科（局）长，他們一般都具有高中或大学以上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教育工作經驗，他們是一个县（市）或一間中等学校里党的教育方針的实际执行者。由于这些特点，规定了訓練目的主要是提高學員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提高他們领导中等学校、中等教育的能力。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归根到底，是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針問題，如何使理論密切結合政治、結合生产、結合实际的問題。而贯彻方針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學員思想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因此必須把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同教师、學員的思想改造工作統一起来。

从我院几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針的过程来看，贯彻这一方針的过程就是两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工作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过程。各种各样对方針的抵触思想，有来自教师的，有来自學員的，归納起来，比較突出的和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論調是：培养与提高不同、普遍与特殊有別。

有人根据我院訓練目的、訓練時間和普通大学不同的特点，怀疑党的教育方針是否能适用于各种

类型的干部短期訓練学校。他們认为：党的教育方針是带有普遍性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干部学校則具有許多的特殊性，它的教育对象已經取得了劳动者的資格，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而是提高。

第二种論調是：理論既然是实践經驗的总结，因此学习理論本身就是一种实践（間接的实践）。我院學員都是在职干部，他們有的是实践經驗，所缺乏的是理論知識，因此，理論联系实际的關鍵在于“联系”，在于首先学好理論，如果不認真学习理論，归根到底还是不能和实践“联系”起来。

上述两种論調以及同这些論調相类似的其他論調，實質上都是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今天并不是用公开反对党的方針的面目出現，而是在拥护方針、承認方針的正确性的幌子之下，通过几个“但是”之后，才轉弯抹角地端出他們的观点来的，所以它們就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騙性，曾經在一部分教工和學員中起过不良的作用，这些观点就成为我院贯彻党的教育方針的最大阻力。因此，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針，首先就必须进行两种教育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貫穿到整个教育工作特别是教学改革中去。

上述第一种論調，把培养和提高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表面上好象是拥护我們的提高的方針，但實質上却偷運了他們的“提高个人”的方針。我們的訓練目的是要提高學員的领导社会主义学校的能力，使他們經過訓練后能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的学校。因此在学习理論中必須密切联系党的方針政策，联系当前的政治运动，联系生产，特別是要强

調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教育思想进行检查、批判。不如此，所谓提高，只能是提高“夸夸其谈的本领”，同我们所要求的高不相容，我们所要求的高，还意味着要提高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思想感情，它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要求得更高一些。

第二种論調把理論和实际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强调学员的特殊性，认为“他们来我院学习的目的是提高理論水平，可以等到将来结业后回原单位才去联系实际”，或者说：“学习理論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没有理論就不能‘联系’实践”，如此等等。这显然是企图把我们的学员引入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末路，以达到他们把党的教育事业蜕化为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目的。

经过了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民炼铁炼钢运动等几个阶段，我们总结出了一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把我们的整个教育工作同当前

的政治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以当前的政治运动为綱，带动各项教育工作和教学工作，促进教师、学员的思想改造和提高。实践证明了这是在干部学校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最正确的道路。

自从我院实行了教学、运动、生产三结合以来，不到半年，整个学院出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了新的风气。这主要表现在：1. 全体师生的劳动观点加强了，并初步树立了劳动人民的感情；2. 社会主义觉悟有显著的提高，集体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个人主义思想不敢抬头；3. 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4. 多数教工、学员掌握了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識，并在生产中进行了技术改革；5. 比較全面較彻底地进行了教学改革，初步克服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教学质量有所提高；6. 科学研究和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深入钻研理論的风气已初步形成。这些成績，有力地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证明了在各种类型的干部短期訓練学校中，只有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才能真正做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目的。

我国教育史上的大革命

广东师范学院副院长 阮鏡清

过去一年是我国各方面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贯彻了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績。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从一年来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就以我们广东师范学院来说，它是一个新办的基础薄弱、师生不多的学校，但在党的教育方针的照耀下，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也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正在实现着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要求。

就全国范围来说，成就更其可观，不少学校已经突破了各种尖端科学了。去年十二月我在北京参观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单就222所高等学校的统计，創造发明及改良工具已有五万六千多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二千四百八十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有一千五百四十四项，超过了过去几年成就的总和。这些事实说明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大大

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創造发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能促进科学研究和創造发明，是因为教师和学生参加到劳动实践中去，实践一定向他们提出挑战，不断地向他们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迫使他們去解决。这就必然促进教师学生的科学研究，使他們深刻地掌握科学知識，并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如果象过去那样埋头书本，总是跟着书本的推理走，就不但不能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科学研究創造条件，而且由于理論脱离了实践，甚至提不出什么实际问题来研究，終于一事难成。

上述的成績，是在不断地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斗争中取得的。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是碰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对的，除了有人頑固地反对青年学生大胆創造外，更普遍的是怀疑学生参加了生产劳动，会降低学习质量，妨碍科学研究。这些人认为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德育和体育虽有好处，但对于智育，则因学习时间减少了，就有妨碍，而与科学研究更难结合。可是上面所說的事实，粉碎了这种謬論。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不单是可以提高教育質量，創造物質財富，攻破尖端科學，更重要的是可以逐步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培養出共產主義的新人，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了條件。許多事實證明：在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學校大辦工廠農場，大搞生產，學生手腦并用，既是學生，又是工人農民，便可使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化，消除他們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另一方面，由於工廠、公社大辦學校，廣大勞動人民普遍學習文化，是工人農民又是學生，這就使工農群眾知識化，克服他們中缺乏文化的落後現象，這就為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進一步展開教學改革運動

華南師範學院副院長 汪德亮

一年來，本省各級學校為貫徹党的教育方針，進行教學改革，曾經做過一系列的工作，如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改訂教學計劃、編寫教學大綱和教材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且在這一改革過程中，大家明確了一切教學改革都是貫徹党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的具體措施。然而這僅僅是改革的開始，因為這次教學改革是我國一次教育大革命，是推翻幾千年教育脫離生產、理論脫離實際的腐朽教育思想的鬥爭，是尖銳的兩條道路的鬥爭，要使這一鬥爭繼續深入下去。我提出如下的幾點粗淺意見：

（一）教學改革是不斷的改革。凡參加教學改革的人，首先必須對這點有明確的認識，才能不斷地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在新教育方針指導下，教育事業天天有新發展，新創造。今天的尖端科學，明年也許成為普及教材了。以後新入校的学生，階級成分越來越好；他們的勞動態度，和生產技能，經過小學或中學的鍛煉，也與今天在校學生大不相同，對他們的內容和方法，又要改變了。我們必須具有不斷革命的精神，承認教育事業也要不斷的革命，才能不斷地鞭策自己前進。

（二）教學改革是教育工作的全面改革。有人說“教學改革是教師的事情”，或者說“我們的讲义指日編完，教學改革可以結束了”。這都是片面

在我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基本完成，全國人民面臨着加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的時候，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以克服過去脫離生產，鄙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種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這是我國教育史上一个大革命，是對舊的教育傳統的大決戰。當然，我們的學校應該以教育教學為主，學生以學習為主，搞生產勞動主要也是為了教育教學，因此我們今天在繼續克服只重視教育教學而忽視生產勞動的偏向的同時，也要防止注意生產勞動而忽視教育教學的現象。現在有一部分學生，片面強調生產勞動不重視教育，不安心學習，那又是應該克服的另一種偏向了。

的說法。過去幾個月，各校進行教學改革，一般是從批判教育思想入手，然後修訂教學大綱，編寫教材、改進教學方法。這在目前是正確的必要的工作，但不是教學改革的全部內容。我們的最高目標，是要把學校辦成為共產主義的學校。所以對教學改革就應該理解為教育工作的全面改革。政治思想、文化科學、體格鍛煉、專業知識，必須全面發展；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必須互相结合；學習、勞動、休息、必須合理安排；初等、中學、高等教育，必須密切銜接；學校、工廠、農場必須經常聯繫；學校機構、規章制度、與教學改革，必須配合。這些都是教學改革應包括的範圍，而貫穿全部的就是党的教育方針。

（三）教學改革是一件大協作的工作。有人以為教學改革是一個學校裏的事情，可以關起門來進行。這是錯誤的，也是辦不到的。全國的學校都要辦成共產主義的學校，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而且全國學校也都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着這一工作。一年以來，各校在不同程度上，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應該有計劃地，採用種種方式，互相參觀學習、交流經驗。例如全國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吸收了一百多萬人參觀，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惜的是校與校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做得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進一步對各種不同的做法與經驗，加以分析，加以綜合，加以評論，把一切好的經驗集中起來。例如廣東省各中學的各科的教

师,对改編教材,都集体地下过一番工夫。最近省教育厅正在組織一批人力,对这些教材,进行評比、修訂、审查。这样編成的課本,就真正是群众智慧的結晶了。我們以为不但編課本应该如此,而且对

其他一切有关教学改革各种問題,都应该在教育厅领导下,进行大协作。那么,对全省的教育将有更大的收获。

贯彻党的教育方針的点滴体会

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杜伯奎

自从党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針以后,启发了很多人的思想,照亮了很多人的眼睛,特别是給我們这些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人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使我們对培养年青一代的目标更加明确。

以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一点来说,过去的确还有许多人認識模糊不清,死抱住“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不问政治,只顧培育“英才”;更有一些自命清高的“专家”和“学者”們,高喊着“政治退出学校”,“教育不能渗入政治”。这真是騙人的鬼話!他們那种脱离政治的教育,事实上却是忠忠实实在为剥削阶级的政治服务,因为他們培养出来的人才,正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忠实的奴仆。资本主义的統治者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家,故意掩盖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抹煞了教育的本质来欺騙人民。只有共产党才敢于揭露出教育这一社会上层结构的本质,公开宣布我们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党在过去和现在的教育政策,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个方針而努力奋斗的。

有了明确的教育方針,才能使教育工作納入正轨,走上光明平坦的道路。半年多以来,許多高等学校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坚决的贯彻这一方針,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論、观点,“兴无灭資”,高高地举起馬列主义的紅旗,明确了必須教育青年坚决走紅专的道路;确定了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之下,实行党委、专家、群众三結合的原则;强調了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变了过去关在书房里进行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脱离实际的方式,广大的师生,走向工厂,走

向农村,走向森林和海洋,加以学校办工厂、开农场,参加全民炼鋼,开始改变了师生的本来面貌,开始变成为既是教师学生,又是工人农民的有文化的普通的劳动者,这是人类历史上嶄新的事情。正是由于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針,政治挂帅,解放思想,发挥群众的智慧和潜力,坚决地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因而取得了教育工作的大丰收。

在我看来,过去一学期贯彻教育結合生产劳动这一方針的結果,有着这样的好处:

第一,改变了同学們过去輕視劳动的錯誤观念,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由于他們自己参加了劳动,認識了劳动創造世界的意义,初步培养了喜爱劳动的习惯,再不象过去那样的畏难怕苦,逃避劳动。劳动的光荣感渐渐在他們之間形成了。第二,使同学們在劳动中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第三,学得了許多有益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識。过去的大学生除了記記筆記,看看讲义,背背公式之外,虽然也做了一些实验或实习,但由于严重地脱离了实践,所获得的知識仍然是空洞肤浅,既不能学以致用,又很不牢固。今天高等学校的同学們在結合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去进行学习,就能使理論密切結合实践,真正成为一个能够手脑并用的人才。第四,在劳动锻炼中加强了他們的集体观念,培养集体主义的精神。

党的教育方針不仅提出了教学改革任务,而且提出了全面的教育革命。目前教育战线上这种波瀾壮阔的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大破大立方兴未艾,我們可以預測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即将开出更加美丽的花朵,結出更碩大的果实来。

全面貫徹党的教育方針，爭取学校 教育工作更大胜利

广东省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严永晃

1958年是伟大的一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形势要求下，教育事业也在高速度地前进，发展很快；变化很大。

这一年来，我們教研組曾到中等学校进行了三次調查研究，深深体察到学校教育的深刻变化。去年一月，我們分赴湛江专区和高要专区进行教育調查。这时，反右斗争正在胜利結束，勤工俭学方在开展，学校教育已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去年六月，我們到佛山专区的中学实习，結合进行教育調查。这时，学校加强了党的領導，发动了群众，生产劳动蔚然成风；教学改革也正在进行，并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三脱离的现象。但那时教材改革还只是停留在砍、换、补、調的阶段。去年十二月，我們又赴佛山专区的中小学参观訪問，这时党已經頒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大家經過学习，对党的教育方針有了进一步的認識。各个学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动师生，大办工厂、农场，进行整頓巩固工作；并在大破大立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教学改革，教材改革已不再停留在砍、换、补、調阶段，而是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在生产劳动与教学工作中，政治思想教育也大大加强了，这就使学校不仅成为教育教學的基地，而且是生产的基地；学生不仅是消費者，而且是生产者；学校培养学生不仅是准备将来走向生活，而且现在就走向生活，亦学、亦工、亦农、亦兵。学校气象一新，师生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上述事实，以及我在北京参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展览会中所看到的一年來貫徹党的教育方針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使我深深感觉到党的教育方針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学校教育必須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綫，必須全面貫徹党的教育方針，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下面就如何貫徹教育方針問題上提出几点意見：

第一，以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教育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为着兴无灭資，培养学生“四种观点”和共产主义风格，学校教育就必须从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出发，把教育工作与引导学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

斗争很好結合起来。要善于在政治运动中，生产劳动中，教学工作中，进行教育。由于青年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識的时期，处在形成共产主义观点与信念的过程中，故必須着重正面教育；但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当前主要的矛盾，社会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学校中来，这又必須开展思想批評。因此正面教育与批評教育必須很好地結合起来。用运动的形式，进行教育，声势較大，旗鼓鮮明，在党領導之下运用群众自我教育运动的形式，事实証明是一种有效的形式，但如果不重視經常的深入細致的教育工作，則思想工作难于巩固与提高，故运动形式与經常教育要很好地結合起来。只看见当前的教育任务，而缺乏不断革命精神，不去引导学生为实现更崇高的理想而斗争，这种教育是軟弱无力的，但如果只进行前途远景教育而不从实际出发，忽視社会现实生活或学生思想实际，这种教育也是空洞无物的，故当前的教育任务与前途远景教育应很好地結合起来。

第二，以系統的科学知識教育学生，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問題的能力，这也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科学知識是来自实践又能回到实践的知識，是正确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識。它对于形成学生正确的观点，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創造才能，都有重要意义。我們必須使学生掌握結合政治、結合实际、結合生产的真正的系統的科学知識，培养学生的科学分析的精神，善于运用科学知識創造性地解决实际問題。在教学工作中，課堂教学是一种主要形式，但应广泛运用现场教学、实验、参观、調查研究等多种形式。这方面河南长葛三中創造了好的經驗，他們把教学与生产劳动很好地結合起来。这是很值得我們学习的好經驗。

第三，在学校教育中要大力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使学生善于領会和欣賞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艺术，发展他們文化艺术的創造才能，开展体育活动，使学生身体正常发育和增强体質，并鍛炼他們的組織性与紀律性，这也是培养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教学改革中的若干体会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杨荣国

中山大学历史系这次在东莞的篁村乡，于参加了两个多月劳动锻炼和比较深入地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之后，进行了一次教学改革，这次教学改革是去年暑假教学改革的继续，规模较之前次深而且大。这次教学改革，对今后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着重大意义。

这次教学改革，揭发了在我系历史教学中的不少问题。比如：有的公开以唯心史观来讲授历史。这虽然是个别的，但他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起了不少坏的作用。有的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讲授历史，但检查起来，只是在讲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签来使用。有的在讲历史上的税制或是与税制有关的其他制度时，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为说明税制而说明税制，而不论其他。有的也说自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教学；可是在他讲授中国历史中，不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是把中国历史上某些革命人物说成十全十美，把他们现代化，好象那位革命人物，在那时就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似的。还有人把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存在的矛盾，不分主次，平行讲授，并且把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矛盾都说成是一个样，都是同样的几个矛盾而没有它们之间的特点。此外还有人在讲授历史当中，不是堆砌史料，就是没有思想感情，或者单纯地作历史事实的介绍。还有的，在讲授历史上思想家的时候，对思想家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所起的作用如何，分析不清楚。如讲宋明理学，讲到程朱陆王，他只是在“尊德性，道问学”上打圈子，到底程朱陆王，是什么观点，争的什么，他无法分析。

这些问题的揭露，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我们历史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还有待清除，否则，要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是不可能。对这次的揭发或检查出来的历史教学诸问题，大家一致感觉，这主要是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问题；如果这问题解决了，就为改进历史教学，改进历史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既然如此，除了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外，应该很

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体系，如果，教师自己不下最大决心，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话，自己也无法学习得好。

为要改变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当前的革命任务来说，就应当积极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改革，要不断革命，从不断革命中进行社会改造与自我改造。同时必须诚恳地接受党的领导，很好地学习和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的整个的方针政策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之，我们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有很好的研究和体会，并使之贯彻于自己的工作当中，贯彻于自己的业务当中。只有这样，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才能有所提高，才能从逐渐提高中运用之于历史的实际。

如果我们一方面能够参加社会的实践斗争，另一方面又有业务的实践，就能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体会。在业务的实践中，比如，把在教学改革中揭发出来的问题，无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都虚怀若谷地、细心地进行分析批判；这，自是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很好的方法之一；同时，这又是我们当前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这样，自己所研究的或讲授的历史，才不会只是史料的堆积或是史料的考证，才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历史讲授中的标签。我们所讲授的才是科学的历史，才是被我们所发现和掌握了的历史发展规律。

这样，自己在讲授历史的时候，就不致厚古薄今，而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为今用。

这样，所讲授的历史，就不致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这样，通过对于历史的讲授，不仅使人们可以学好这门科学；主要的，还从讲授历史之富有强烈的阶级感情中，提高了人们的阶级觉悟，而又理解了历史的方向，和它的前进的道路。

对于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 杨荣春

党的教育方针具有高度的党性和实践意义，如果光靠阅读一些有关教育方针的论文报导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这个方针在字面上好象不难理解，但要真正认识它倒不那么容易。我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自以为自己曾经读过关于这方面的不少书报、又是专搞教育史的人，难道还不懂？可是，当我读了陆定一部长“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后，才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真正懂得全面发展教育的意义，甚至还把它错误地理解了。

问题在那里呢？

首先，我认为要理解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它。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任务的明确的指示，是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典范的阐明。可是由于我不懂得“社会主义觉悟”的实际内容，不懂得“劳动者”的真正意义，不明确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理，因而就不明确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资产阶级“为教育而教育”、“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那一套。关键在于我还没有根本改变立场、观点，因而

就不能很好的认识党的教育方针。不懂得社会主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要使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教育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彻底实现。

其次，我认为要理解党的教育方针，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一个人如果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实践，从中得到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那么对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认识就比较透彻。但因为过去我自己很少参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实践，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只是从字面上去“认识”党的教育方针，当然就体会不深。去年冬天，我到黄埔公社参加了一个多月的体力劳动与协助文化革命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参观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感性知识，对于党的教育方针的认识，就不象过去那么抽象。因此，我认为要真正认识党的教育方针，必须不断地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与生产劳动的实践中锻炼自己。

当然，作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党的教育方针只是做好工作的起码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正确认识方针的基础上，正确地贯彻执行它，使我们的教育事业符合劳动人民的要求，真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我对教学改革的体会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锡祺

教学改革是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改造，也是学术思想上深刻的自我革命。

在我过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首先，我名义上虽然在讲人民的历史，实际上则经常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我的口中，几乎只听到几个英雄伟人、革命领袖，甚至一些反动头子在那里跳动。我虽然也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近代中国

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但在具体分析时，却贬低了他们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好准备的今天，是毒草，是绝对不容许传播的东西。为了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了改造和挽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入开展教学改革，那是适时的也是很必要的。

教学改革开始时，我也曾考虑过面子的问题。经过党的教育，我认识到爱个人的面子，本身就是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許多人因為愛個人面子，長期隱瞞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害怕別人的揭發和批評，結果在錯誤的泥坑中愈陷愈深，以致身敗名裂。明明瘡疤里面已經化膿發臭，卻不肯揭開蓋子，擠去濃血，讓它重生新肌。我過去教學不負責任，為了追求個人名利而搞科學研究，在課堂上公開販賣資產階級的貨色，在群眾的眼里，早就沒有面子，為什麼還要為那本已不存在的東西，徘徊反顧呢？如果現在還不肯下決心與資產階級思想決裂，其結果不僅害了自己，還要遺禍別人。今天愛面子的人，應該愛集体的面子、社會主義的面子；應該勇敢地投入教學改革運動，大胆暴露，嚴格批判。在一天等於20年的今天，不是你願意不願意改的問題，而是非改不可的問題，不改則是自絕於進步，自絕於社會主義。

有了以上的初步認識，我就毫無顧慮地自我檢查，虛心聽取群眾對我的批評。當然，聽到比較尖銳的意見，特別是和事實有些出入的地方，並不那么好受，甚至感到非常沉痛。但審察一下同學的態度，是善意的，誠懇的，意見本身总的精神也是正確的，而且主要的方面，確已击中我的要害。良藥苦口利於病，同學們的意見，正是我今後改進教學最好的參考。這樣一想，我就慢慢心胸開朗起來，由低沉轉為振奮，由抵觸轉為感激，由沉重自卑變為信心百倍。

經過這次教學改革，我深深体会到黨對知識分子的關懷愛護是無微不至的。黨領導這一運動時，充分發動群眾，首先是思想發動，對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再三交代政策，反復說明運動的目的和要求，鼓勵大家自覺革命。檢查批判以後，又發動同學訪問老教師，深入談心，進一步交換意見。

下鄉三月余，勝讀十年書

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師 陳則光

下鄉勞動鍛煉以前，對“勞動創造世界”，“勞動是光榮的”，勞動人民如何如何。即使能說會道，實際並無亲身体會。紙上談兵而已。這次下到人民公社勞動三個月，才算嘗出一點滋味來。

許多知識分子都自以為自己有滿肚子學問，但一下到農村，就會很快的發現自己那些從書本子上搬來的學問，實在有限得可憐。我們天天吃糖，餐餐吃飯，但甘蔗怎樣變成糖？秧苗怎樣長出谷子？却懂得很少。砍柴，鋸木，割禾，鋤草，……看來

作為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只要他真正要求進步，不能不受感動。這一切應該看作是黨對自己的教育，對自己的挽救，如果沒有整風和以後一連串的運動的教育，特別是不經過黨號召我們下鄉勞動鍛煉幾個月，我們就不能有現在的思想覺悟基礎，就不能接受這一次教學改革；縱然接受了，也不能在自覺革命的基礎上，取得這樣大的成績。通過這次運動，我進一步認識到，要在教學與科學研究上拔白旗，插紅旗，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認真接受黨的領導，聽黨的話，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了。

經過這次運動，我進一步体会到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群眾力量的偉大。青年同學們讀書並不多，但經過整風、反右以及勞動鍛煉之後，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發揮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幾天之內，採取分工合作的集體主義方法，查完了所有老教師的講義、筆記、著作，系統地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連過去曾認為是高不可攀，難讀難懂的一些著作，現在，依靠集體智慧，也找到關鍵性的錯誤，提到原則的高度來進行系統的合情合理的批判。同學們在編寫教學大綱教材中，也表現出很高的創造才能，他們在十二天內，就編出了教學大綱和全部講義，這在過去是不敢想象的事；然而，他們做到了，而且進度一般走在老師的前面。這說明在黨的正確的領導下，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也說明了黨的教育方針中三結合的方法、師生一起搞教學和科學研究的方法的正確。今後所有教師，都應當積極貫徹“三結合”這一新的教學方式，發揮應有的作用，跟同學們一起，多快好省地為祖國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

似乎簡單。但正式拿着斧子、鋸子、禾鏟、鋤頭干起來，可不那么容易，其中大有奧妙、竅門在。至於搞豐產田，開深耕，築水庫，燒炭煉鋼，……我們最多只能充當一名學徒，一切都必須從頭學起。這一切使我深切地感到：讀書破萬卷，如果不與生產勞動和實踐相結合，就沒有什麼用場。真正的學問，在於能解決實際問題，有助於物質財富的創造，在於既能正確的認識世界，又能革命地改造世界。象我們過去所學的那一套，業務脫離政治，

理論脫離實際，閉門造車，怎能說得上是真正的學問？

書本的知識，只是完整知識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中得來的。而這些都是與生產勞動分不開的。生產勞動，對於知識分子說來，是最好不過的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教材和讀本。只要你肯學，就會使業務與政治，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從而獲得比較完整的知識和真正的學問。

農民有豐富的生產知識，有高度的勞動熱情和工作魄力。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把自己所有的知識、經驗、力量、智慧、技能，無條件、無保留的貢獻出來。農民拼命工作、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精神，更是使我們深為感動。自大躍進以來，男女老少，日夜苦戰，干劲沖天。到評工資時，只開幾次會就順利的解決了，有人還說：“只要有飯吃，就是不發工資也沒關係。”從這件事，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山大學評工資的情況。開了百多次會，結果不少人却怨自己評得低，大鬧情緒，甚至消極怠工。

兩相對照，不是很清楚的說明了農民的風格，比起知識分子來，要高得多嗎？

農民們是衷心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他們的思想、感情、作風、都有值得我們知識分子學習的地方。他們往往一句話，一個細小的表情或行動，就夠人深思，反省，懷念。許多下放同志就在和農民共同勞動，共同生活中放下了知識分子臭架子，改變了世界觀，跟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三個多月的勞動鍛煉，深深体会到黨的教育方針的偉大正確，它把我們引向了一條光明遠大的道路。只有業務與生產勞動緊密聯繫，才可能當好人民教師，把書教好。只有生產勞動經常化，才能真正做到政治掛帥，紅透專深。只有到工農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才可能寫出好作品。只有使知識分子工農化，才能徹底根除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學術思想、文藝思想。下放三月餘，勝讀十年書。這個結論，並不誇張。

黨的教育方針完全適用於外語專業

中山大學外語系主任 戴錫齡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黨的教育方針。黨的教育方針對於一切學校、一切專業都是適用的。因為不管那一類型的學校，專業的特點如何，他們有個共同的地方，即它們所進行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教育，而是由共產黨來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教育，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既然如此，就沒有任何學校，任何專業，可以視為例外，可以不學習政治或是不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

拿外語專業來說，是否可以強調什麼專業的特殊性，不必學習政治和參加生產勞動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外語專業比某些其他專業更應該多學習政治和搞好生產勞動。

首先談學習政治問題。

語言不是上層建築，語言沒有階級性。這句話常被某些人利用來作擋箭牌，認為外國語不過是一種工具，學習外國語的人能掌握工具就行，學習或者不學習政治是無關緊要的。但事情很清楚，不管什麼工具，總要人來使用，究竟它起什麼樣的作用，為誰服務，就要看它掌握在什麼人手里。外國語在現代國際事務中是每時每刻都在被利用着的，敵人利用它，我們也利用它。它已不是普通的工具，

而是重要的鬥爭工具。敵人利用它，千方百計地煽動戰爭，誣蔑社會主義陣營。可是外國語在我們手里，通過我們的刊物和廣播，就成為反擊敵人、保衛世界和平的有力的武器。但只有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外語工作者，才能在国际事務中正確運用這一工具。運用外國語，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一個音節都馬虎不得的，這裡主要不是語言技巧問題，而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問題。一個人儘管他掌握了外國語這個工具，如果他不關心工人階級的政治，他的工具不一定能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甚至可能有利於敵人。外國語作為工具來說，既有這樣的特點，學習外國語的人，就不但應該學習政治，而且還應該學習更多的政治。

現在再談參加生產勞動的問題。

學習外語的人，要不要參加生產勞動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學習外語的人同樣要全面發展，要又紅又專，要手腦并用，要理論聯繫實際，沒有什麼例外可言。生產實踐的經驗對於學習外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增加切身的体会和經驗，並改變對於知識的看法，才能在外語學習中得到比較完全的知識，並把書本的知識和實踐的經驗統一起來。外語學習脫離實踐是長期以來

存在的問題，但始終未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确答案。現在從強調生產勞動和端正對什麼是知識這問題的看法入手，相信過去學習外語的缺點可以基本上得到糾正。

學習外國語的人，下工廠，下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從書房走進廣闊的現實生活中去，擴大自己的眼界，看到許許多多正在變化發展中的新人新事。這不但使他有機會鍛煉自己，培養群眾觀點、培養工農的思想感情，在政治上取得豐收；而且下鄉下廠在生產勞動實踐中，學習工農的語言，熟悉物質生產領域的詞匯，熟悉現實生活的情况，這不僅豐富語言的內容，也有利於運用外國語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難道一個關在書房里，從不曾見過生動偉大的現實的人，僅憑書本子的外國語，能恰當地運用這個“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把事情說得清楚嗎？難道從未參加生產勞動的人，能

够了解工农群众、能够运用外国語言充分表达出工农的思想情感嗎？当然不能。可是，也有人的想法和我們不同。他們不但反对生产劳动，甚至反对选用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外國語的文章报道。他們認為这样的作品文体卑俗，不够古典，不是莫利哀，不是莎士比亚；他們厚外輕中，覺得學外國語的人應該多讀外國書，多看外國歷史，多欣賞外國事物，本國的一切倒是次要。因此不但對当前的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熟視無睹，而且竟然把漢語也看成不必要。不是曾經有人認為漢語不及西歐語言完備優美么？

在從事外國語教學的人員當中，尤其在学习西歐語言的人當中，的確有一部分如上述那種人，他們受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毒害，有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說明，在外語專業中，更應該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書初稿即將完成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書初稿的撰写工作，現已接近完成。

在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所屬各機關單位、科學研究機構、高等學校及圖書檔案部門均參加該書的編寫工作。各編寫單位都由領導掛帥，擔任各編輯組或編寫小組的組長，親自起草編寫綱要，有些負責幹部還脫產或半脫產來擔任重要章節的執筆人，此外，還從各單位抽調大量的專職幹部進行這一工作。

在科學工作中走群眾路線，展開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協作，是工作中的一个顯著特點。有些單位派遣工作組下鄉下廠，進行調查訪問。不少專區、縣、市的檔案部門廣泛地發動當地群眾，為編寫該書提供資料。發動高等學校學生進行整理資料的義務勞動。訪問革命前輩，將廣東地區革命鬥爭的史實紀錄下來。各單位之間、單位內各部門之間，分別就自己的業務範圍進行協作，編寫資料性文稿交由編輯組匯總。省委檔案館等部門，還特地組織了一批力量，就數萬份有關現代廣東革命鬥爭的珍貴文件，進行整理、取舍和復制，各編、章、節的編寫亦採取集體執筆的形式，分頭寫出初稿後即廣泛徵求意見，再經集體討論修訂。

經過三個月來全體編寫人員的積極工作，不少章節現已寫成初稿。目前編寫工作正在加緊進行，本月底即可完成全書初稿。“伟大祖国的广东”編纂委員會，現正準備力量，進行全書的匯總和修訂工作。（彥）

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稿

杨荣国

刘节先生最近两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并写出了一部近四十万字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其用功之勤，自可想见。

刘先生平日曾这样说过：我的中心思想就是“理”，由于有了它，使我能够安身立命。又说：我们这个“理”，不是“理在事中”之“理”，而是“理在事外”之“理”。这样说，他的思想是属于程朱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唯心论思想。

刘先生的这部中国史学史的讲稿，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写成的，他的意图，就是要在中國史学方面，建立起客观唯心论的史学体系。

刘先生在“叙论”中曾这样说：“历史家选择史料的主观见解，是作为史学内容的基础的”。按刘先生这所谓“主观见解”，应当说是历史家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历史家，应有他的中心思想来说明历史，“作为史学内容的基础”。这中心思想，从刘先生来说，自然是这“理在事外”之“理”，明确地说，亦就是以这所谓客体精神的“理”来说明历史，说明历史的变化与发展，是这一客体精神的“理”在指导着。

接着，他又说：“由主客的思想，转入客观事实的分析与综合，以达到叙述全体人类的生活为目的，这是历史编纂学发展到最高一阶段了。”按这所谓“主观的思想”，应当是历史家的中心思想。从刘先生来说，历史家以这所谓客体精神的“理”，以叙述全体人类的生活为什么是如此，这是历史编纂学发展到最高峰。

虽然刘先生这些话表面上是评述过去的史学，实际上也是在阐明他的治史学的中心思想，他的治史学的意图。这中心意图就是：历史是客观唯心论的历史，史学是客观唯心论的史学。

刘先生在它的历史论中曾明白地这样说：历史上的法则，有两种：自然法则与人为法则，前者是

以理性为基础；后者是以欲望作基础，因而在导引之服从于自然，服从于理性。①他这所谓“理性”，亦即是“理在事外”之“理”；就是说：这一所谓客体精神的“理”在支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他又说：历史的第一阶段，是从自然法则走向人为法则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从人为法则反回自然法则的时代。②亦即反回到这一所谓客体精神的“理”。

简明地说，刘先生的意思是：

历史是从这一客体精神的“理”（又谓之自然）出发；经过人为，而返回于这一客体精神的“理”。

因而在人为的时代，在于发现“社会理性”。③因而肯定“过去的历史是理性同蛮性的斗争史。在有形的物质的方面看来，似乎还是蛮性胜利；若就其全体看，在无形的精神的方面，是理性胜利”。④

这样说，刘先生所认为的历史，不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恰恰与之相反，而是所谓这一客体精神的“理”所主宰着的历史；因而刘先生的历史观自是和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史观。

在他的这一历史观点指导之下，他所写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讲稿”中，他把从对生产斗争中所反映在荀子思想中的戴天主义思想，和从阶级斗争中所反映在易系辞传中矛盾变化的发展思想——予以抹煞，而认为在战国时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是那时历史学家所体会出来的历史哲学。

① “历史论”，“历史上的两种法则”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科学对于人类的贡献”

他之所以认为这是当时的历史哲学，就是这些话符合他的历史观点。所谓“积善之家”，其所以“必有余庆”，就是这些家符合了他的所谓自然法则，——这一客体精神的“理”；而那“积不善之家”，其所以“必有余殃”，就是这些家违反了他的所谓自然法则——这一客体精神的“理”，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自也是如此，不是以他的所谓理性作基础，所以才如此；不过，从他看来，不论如何，最后还是返回到这一客观精神的“理”的。

刘先生就拿这些话来论证他的历史观点之正确性(?)。从而亦说明这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是这一所谓客体精神的“理”所指导着的。

同样的，刘先生论述到两汉的史学，对于司马迁的“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这一富有科学性的历史观点，和他的人民性，不仅没有予以阐述，反而在另一面，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见解是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从而“拨乱世而反之正”，说司马迁和他的父亲谈是这样承接易传的思想的。刘先生这意思是很明显的，在刘先生看来，“前言往行”，反映着这一客体精神的“理”，“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自是这一客体精神的“理”获得了充裕的发挥，从而才可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返回到自然法则——这一客体精神的“理”。

这不是很明白吗？刘先生的意图，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中，不仅见到了汉代历史家的历史观点是唯心史观，特别是从秦汉的历史看，它的规律，亦是所谓理性战胜蛮性，亦是说明历史是由这一客体精神的“理”所支配着。虽然刘先生在讲稿的某些地方也提到司马迁的人民性，但提得很勉强，远不及他阐明司马迁历史观点中的消极部分。

同样的，刘先生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把一些重要的史学家如范曄、陈寿等诸人的史学思想置而不顾，反而把西晋的皇甫谧诸人的历史哲学作了一番详尽的论述；虽然刘先生认为皇甫谧诸人的著作，对于后来人的影响并不很大；但认为他们自成一格，故非详细论述不可。而在实际上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之类，他之“追述远代”，如刘勰所说，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訛滥之本源，述远之巨蠹”，①怎的值得作详细之论述呢？

而刘先生之称述皇甫谧，意图是很明显的：

他认为：“皇甫谧把易传中的‘太极’一观念（意即太极是观念的东西）放进去，便成为他自己的天地生成论”。②那也就是说，皇甫谧是认定世界由客体精神的东西——太极，而产生出物质的东西

——天地万物，他是客观唯心论者。而皇甫谧又以这种客观唯心论的思想体系用在历史著作上”。③这和刘先生的史学体系相合，是客观唯心论的史学体系，所以刘先生不仅不予批判，反而予以阐扬。

按名教即所谓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又被视为是人之天性，这天性就是“理”，所以礼记乐记云“天理灭矣”，郑玄则注释说：“理，犹性也。”这样说，天性即天理了，天理就是客观存在着的精 神的东西。客观唯心论者北宋程颐曾这样说：“自理（五常）言之，谓之天（客观存在）；自禀受言之，谓之性（秉赋于人之谓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④于是说来，三纲五常就是理，理是客观存在着的精 神的东西，而名教就是理，那么，名教自是客观存在着的精 神的东西了。

而刘先生对于东晋袁宏所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⑤和袁宏批评前人治史，对于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韜而未叙”，⑥说袁宏这看法比较深刻。这样说，刘先生是肯定了袁宏的名教思想。同时，前已指出，刘先生认定历史上有两种法则，除人为法则外，还有自然法则，这自然法则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因而刘先生对于袁宏的这一比较深刻的看法，引证了陈寅恪先生对于袁宏这一深刻的看法的阐发，陈先生说“名教实由自然递变而来，故名教与自然并非冲突”。⑦前已分析，名教即客体精神的理，而历史的自然法则又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故陈先生说“名教与自然并非冲突”，刘先生认为这是很好的阐发。意思很明显，刘先生之所以认为这是很好的阐发；就是陈先生这话证实了刘先生乃客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之正确(?)。所谓历史上的人为的蛮性一定为自然的理性所战胜(?)。

同时，袁宏曾这样说：“夫称诚而动，以理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为身，此利名教也。情于名教者少，故道深于千载，利名教者众，故道显于当年”。⑧刘先生特别阐论这一番

① “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第十六。

② “中国史学史讲稿”八，“文学玄学与史学”。

③ 同上

④ “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伊川语录。

⑤ “后汉书”纪序。

⑥ 同上

⑦ 陈寅恪：“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⑧ “后汉书”纪卷二十三。

話，如“称誠而动，以理为心，”以刘先生的主张，所謂“自然法則，以理性为基础”，那么，袁宏这话，自是合乎自然法則，亦即合乎这一客体精神的理，这是“情存乎名教”，而那“不情存乎名教”的，自是刘先生的所謂“蛮性”，从刘先生看来，自可为“情存乎名教者”所化。当然，我們知道，刘先生之这样卖气力闡述袁宏的这一論点，就在于闡揚刘先生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

不仅如此，刘先生通过袁宏的話，还大肆譏諷那“道显于当世”的，而闡揚那“道深于千載”，叫大家都去做“情存乎名教”的逸士，都去脱离现实而自命清高。我不知，刘先生今日在人民的講堂上，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中，作这样的譏諷与闡揚，是为了什么？

对于王船山，刘先生虽然一面同意侯外廬同志的話，王船山不是“理在事先”而是“理在事中”的唯物論者，但是，对侯外廬同志說王船山“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却予以否定，而认为“只能这样說，王船山确乎是有很丰富的反传统的精神”，^①从而花了相当篇幅說王船山是反传统而不是反封建。刘先生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刘先生在他的“历史論”中有“传统与真理”一章，在这章中，刘先生这样說，“传统是一种保守势力，对于过去文化上的优点，能够保存；但是传统之中也保存許多污点”，如“人类的心理，表现于文化方面的，凡是真的、美的、善的，似乎很难保存，往往把假的、丑的、恶的，保存得很久。这是什么緣故呢？因为真理很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人性沒有普通的改良之故”。固然，从我們来說，过去的优良传统，如科学性人民性的东西，我們自应从保存中而予以发扬光大。可是，刘先生意不在此，刘先生从他的客观唯心論的观点出发，自然法則，以理性为基础，而人为法則则是以欲望为基础，人为法則中有的有自觉的理性，但有的則不一定，还是欲望占优势；不过，刘先生的意思，最后还是为这一客体精神的理所战胜，所謂“理性战胜蛮性”。而刘先生的所謂反传统，就是說“理性战胜蛮性”，就是在宣扬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这样，刘先生把王船山的“反抗封建的精神”，說成是“反传统的精神”，那就是說，王船山在实际上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是以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来写他的讀通鑑論、宋論的，是以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来反传统，而不是以唯物主义精神来反封建。刘先生在講稿中不是这样說嗎？王船山虽然“处处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但“王船山的学問，基本上还是

宋明理学家的气派”。那就是說王船山是程朱一派的“理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不是如侯外廬同志所分析的是唯物論者。

当然，刘先生所以要把王船山說成是客观唯心論者，意思很明显，就在于說明中国史学之客观唯心論体系之无可置疑。

刘先生把黃宗羲的反君主专制，戴名世的反对清朝統治，都說成是反传统；其中特別对戴震的以唯物論的观点来反对程朱一派的客观唯心論；刘先生說戴震的思想体系是出于朱子，思想体系既出自朱子，那么戴震自也是客观唯心論者而不是唯物論者了，从而戴震反对宋儒的以理杀人，也就成为如刘先生的所謂反传统了。与戴震同时的章实斋，他的“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闡述了他的世界观，他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从而反对“离器言道”，而肯定“道属于器”，应当“即器以求道”——这显然是唯物論观点；于是他以唯物論观点，駁斥宋儒的“舍器而言道”；可是刘先生也认为章实斋的思想和戴震一般的是出于朱子，因而說“章氏的哲学思想，还只能說属于客观唯心論的范畴”；^②从而认为章实斋“掌握了这一基本精神，来批判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并說他“是一个伟大而有創见的学者”。^③意思也很明显，就是要把章实斋說成是客观唯心論的史学家，从而說明客观唯心論的历史观点之具有真理性。

另一方面，关于历史事实的怀疑与考証，本来，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于某些人物事迹和年代感到有关問題或尚不甚清晰的，須待弄清楚后，才便于叙述或分析研究，在这情况下，把所怀疑的或弄不清楚的史实考訂清楚，自有必要。但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怀疑与考訂，自不应是史学的主流。用不着多所論述；可是刘先生从北宋一直到清代，关于怀疑与考証两派都作了极为詳尽的闡述，从黃震、王应麟一直到姚际恒、崔东壁，特別对于崔东壁，說他的“疑古精神，是繼承刘知几疑古惑經以来的风气”，是“优良的传统”，是“科学的态度”。^④称赞的无微不至。而不从史学发展的时代的本身去考察，宋代史学发达，但黃震和王应麟的史事考証，并不是当时史学主流，当时的主流

① “中国史学史講稿”十六：“王夫之史論”。

② 同上十九：“章学誠的史学”。

③ 同上

④ 同上十：“古文学与疑古学派”。

倒是着重于当时的历史的写作研究。至于清乾嘉时代一般人之所以致力于古史的怀疑与考订，这是清初反动统治者压迫的结果而不是史学界的正常现象，是不值得怎么大书特书的。而刘先生却认定这时的历史考据学是一个特色。同时他们的这种工作，只能说是属于历史资料的整理范围，更不能夸大为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

当然我们知道，刘先生是属于“古史辩”派的，而“古史辩”是在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是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对于古史的怀疑与所谓考订。同时，我们又知道，实验主义是主观唯心论，而刘先生的观点是客观唯心论，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一个主观，一个客观，但其实质是一样的，说“理在事外”是客观唯心论，而其实事外何尝有什么客体精神的“理”呢？所谓客观的“理”，如三纲五常还有主观的产物吗？而其所以把它说成是客观，这是为了便利于反动统治。因为这一精神的东西——“理”，如果把它说成是客体的存在，而不是主观的捏造，就好麻醉人而易为人所相信，就可被视作为天经地义的，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

而刘先生在中国史学史讲稿中之所以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疑古与考订两派，除了表明“古史辩”派是有它的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外，另一面则企图为被批判的古史辩派找市场，而予以复活，从而导引同学们埋藏于故纸堆中，从事于烦琐的考订，脱离现实，脱离党的领导，做一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刘先生不是在讲稿中这样鼓励过同学：在这方面，只要“有人肯下工夫”，“必然要远胜于前人”吗？

刘先生在讲稿中又会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真理就是要我们在历史事件中发现传统的真面目，只要我们提高理性的认识，深刻的分析历史事件，就可以叫它物无遁形”。^①刘先生这话乍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细分析，真理只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中才可以发现，若离开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而单是运用那具有阶级性历史的片段资料进行考订，那便不是也不可能发现任何的真理，而只能说是把历史资料整理了一番，如是而已！而

刘先生之所以说，这是真理，只是因为刘先生的所谓真理，是这一客体精神的“理”。刘先生的意思，不是要通过考据而发现传统的真面目吗？所谓发现传统的真面目，前已指出，就是发现历史中理性与蛮性，发现历史中蛮性如何为理性所战胜，所以要提高理性的认识才可以发现这一传统的真面目，使它物无遁形。（按：刘先生所谓理性的认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与感性的认识相对的理性的认识；他的理性的认识，是客观唯心论观点，就是要用客观唯心论观点，通过历史的考证来发现理性与蛮性，发现历史之为这一客体精神的“理”所支配。）所以刘先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疑古与考订两派，除了前述的意义以外，贯彻他的唯心论的史学体系自是他的主要意图所在。

总的说来，刘先生是资产阶级客观唯心论者，他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讲稿”是运用这一观点写成的，可是，由于他在写的过程中，为了要有所“应付”，写的似不显得那么自然，吞吞吐吐，或隐或显，虽是如此，但他的错误的立场观点还是相当明显的。这是一部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立场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抗的“中国史学史”讲稿；同时，因为刘先生的这部讲稿，又再一次说明历史科学是怎样的一门阶级性很强烈的科学，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如何从提高我们的政治认识与理论认识中来学习这一门科学，从而加强我们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批判，加强我们学术思想上的战斗。

当然，刘先生从整风反右以至双改，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下到东莞参加劳动锻炼，和在劳动锻炼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改革运动当中，刘先生的表现就不是“应付”，而是比较好，是有所进步的。比如：他的这次教学思想检查就是比较诚恳，比较深入的，我们批判刘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我们更欢迎刘先生的进步，希望刘先生在这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改造立场观点与方法写一部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中国史学史”来，我们这样渴望着。

① “中国史学史讲稿”六：“明史与清代的史狱”。

評岑仲勉先生“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封建制度)来自突厥說”

中山大学史三乙学生 胡少华

岑仲勉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多年，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岑先生認為我国古代，从生产力的发展(青銅和鉄的冶鑄和使用)、社会制度(封建制度)、以至上层建筑 and 語言，都是由突厥或涂兰^①传来的，而这又是由于我国上古的居民大多数源自突厥或带有涂兰血统造成的。这种观点，遍见于岑先生有关突厥史、考古学和两周、隋唐的科学著作中，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称之为岑仲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封建制度)来自突厥說。

我們認為：岑先生的这种观点是錯誤的，与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不符。而岑先生所以发生这种錯誤，我以为是出于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所导致的。

首先，讓我們来研究中国上古居民是否大多数源自突厥的問題。

岑先生曾論証：“汉族一部分西来”^②。又認為：“狄为突厥族”^③，“夏为戎族”^④、“秦是戎族”^⑤、“周人与西戎同一种族”，而“戎族与突厥和涂兰則有着密切的关系”，楚亦非东方民族^⑥，“东胡极可能由西比利亚南下”，商族来自东北。所以“秦以前之‘汉族’，原含有涂兰因素”^⑦，等等。按岑先生的說法，中国古代各族，除商系来自东北以外，就几乎全是突厥族或是其旁支了。这就很难使人不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岑先生正是在为中国入种西來說做苦心的論証，以示其正确性了。同时，按照岑先生的論断，就势必要得出这样一个錯誤的結論，即在我国的領土上，除东北外，在突厥等西、北方各族未迁来之前，不仅沒有产生任何文化，而且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曠土。

岑先生論述的“汉族先天实含涂兰族之混血”，主要論据之一，是“汉语本含有若干涂兰語素”^⑧。“周族本来操拼音語”，只是在征服商以后，經過文王时代“一个时期的訓練”，才“利用商族的文

字，写他們的語言”，“把拼音語解散为单音”。岑先生还考定了“丕显”、“蔑历”、“对扬”三个周金銘的熟語，与“印伊語有共通的地方”，作为証据^⑨。

我們認為，这些論据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个别不能代替一般，两族間少数語汇有共通的地方，并不能就此証明周族原操拼音語。

第二，岑先生对这种“共通的地方”的考定，大多是牵强附会的。

第三，即使周語确与印伊語有許多共通之处，也不能就此肯定周族与突厥有血緣关系。

因为，語言是人們共同体(族、部族、民族等)的主要特征之一。語言学对研究各族起源和相互关系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語言絕不是人們共同体的唯一特征。因此，“語言中的某些相似絕不能作为它們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和统一的民族的任何根据”。即使是两族語言非常接近以至属于同一語系，这两个族也可能是彼此独立的。例如：“在奥斯坦突厥人和维吾尔人民之間，除了語言上的某些近似以外，是毫无共通之处的”，苏联中亚細亚的烏茲別克人、土尔克明人、卡查赫人、基尔吉斯

① 见“隋唐史”、“两周文史論丛”等书。

② “两周文史論丛”18頁“汉族一部分西来之初步考証”。

③ “两周文史論丛”147頁。

④ “西周社会制度問題”“汉族构成的分子”。

⑤ 同上

⑥ “两周文史論丛”55頁“楚为东方民族弁”。

⑦ “突厥集史”下冊1095頁。

⑧ 同上，史1094頁。

⑨ “两周文史論丛”序言及“从汉语拼音文字联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人，都是属于突厥語系的，但都是独立的民族。事实上，突厥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不論是文字資料或考古学的材料，都还暂时不能确定紀元前一千年至二千年中的突厥的情形。^①

从語言本身的特征来看，語言不属于上层建筑，“語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詞汇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特点的本質。历史表明，語言有巨大的穩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語言，……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語言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②，岑先生认为周的文化比商高，周对商又是征服者，作为一个征服者而又在文化上比被征服民族更高的民族会舍弃了自己的語言而改用被征服的民族的語言，这是很难理解的。正因为这一論断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岑先生不能不說：“周族凭什么理由把拼音解散为单音，是不是他們本来沒有文字，抑者以为商文比較好用，我现在还无法解答”。其实語言的产生，是人类长期劳动的結果，而且是經過长時間发展起来的，决不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愿望，以一紙命令将它取消或改变过来的。而周竟能在短短的文王一代就可以将原来的拼音語言改变为单音語言，这只有在神話里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企图从語言有共通之处以論証中国古代居民与突厥有血緣关系，或企图以此来論証所謂中国人种西來說，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是唯心史观的。

二

岑先生对我国古代青銅器和鉄的冶鑄、使用，也錯誤地認為是由突厥传来的。

岑先生的主要論据有二：一是認為我国青銅、銅、鉛之古称，均与西方語言有音声联系；一是因为我国古代青銅器上的某些图案和花紋，如大蓮花和饕餮紋等与西亚相近似，是从西亚传来的。与他認為中国人种来自于闐一說相适应，他又說：“我国上古之青銅鑄业，以于闐为輸入之一途”^③，把青銅的冶鑄和使用，完全归之于外来。

我們認為：某些由外传来的事物的名称，有采用外来語音的情况；但并不是凡事物的名称与他族有所謂音声的联系，就肯定它是外来的。这只要举出一个最显浅的例子就可以說明了。在解放前，我国滬、穗一带，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有些人往往将拐杖称为“司的克”（Stick），有些报章杂志，也相互沿用。但我們能否就根据这一点

来論証拐杖也非我国所固有，而是英国传来的呢？显然不能。

同时，我們認為，也不能从青銅器的图案、花紋上，即外形与西亚相似，就把青銅冶鑄的技术也归之于外来。我們并不否認古代相邻各族文化的互有影响，但是也絕對不能同意以此来否定各族劳动人民的独立創造。如果按照岑先生以外形代替本质的邏輯，那么，穿西装的中国人也会被当作外国人了。

我国古代青銅技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原始公社末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独立創造出来的。我国青銅术的精美，是举世无匹的。大批青銅器和冶銅遗址的发掘，証明我国的青銅冶鑄，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青銅冶鑄的发明，更在商代以前。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結果，是我們祖先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結晶，不是什么西来的。

岑先生又認為我国鉄的使用是由突厥传来的。理由是：“按西比利亚一带，向产鉄矿。北周书称突厥本茹茹鉄工。突厥呼鉄曰 Tamur，其第一音組之 Tä 与汉语‘鉄’之发音相同”。因此，“我国对鉄之应用，相信本从西北方輸入”^④

我們知道，中国与突厥发生关系，最初见于史冊的，是在西魏大統八年（公元542年），中国与突厥貿易往来，还要迟几年，即在西魏大統十一年（公元545年）。但我国史冊上关于鉄的記載則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国語齐語就有恶金（鉄）用来鑄农具的記載。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已用鉄鑄刑鼎。可见，早在我国与突厥往来的一千多年前，我国冶鑄技术已經相当发展了。近年来輝县、兴隆等考古发掘出土的鉄制工具和冶鉄遗址，也是明証。我們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发展，还会有更多和更早的鉄器和冶鉄遗址出土，更加有力地反駁中国用的鉄传自突厥的謬說。

① 那比耶夫：“反对闐释維吾尔史中的大突厥主义和大伊郎主义”，載“为正确闡明苏联中亚細亚各民族底历史問題而斗争”，193—199頁。人民出版社五四年版。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北京版，24頁。

③ “西周社会制度問題”38頁。

④ “隋唐史”卷上第四节23頁。

岑先生认为我国的封建制度也是由突厥传来的，这更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岑先生说：“封建——节级分地，为突厥族之古制。我国周代之茅土赐诸侯，诸侯畀之卿大夫，卿大夫畀之士。又突厥平服中亚，使室点密治之，即藩封之制也”^①。在“封建社会的建立应放在西周初期”一文里，岑先生又着重地阐述西周的封建制度系来自突厥这一观点。

综合岑先生的观点，主要如下：

（一）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初期始，周族与突厥有血缘关系，来自西北方，封建制度就是周族在更早以前，从西北的突厥处传来的。也就是说，早在西周以前，突厥已进入封建社会或至少已具有封建主义因素。

（二）突厥古代的节级分地，就是封建制度。

（三）“欧洲之封建制，系从北方蛮族所输入”，所谓蛮族亦与突厥有关。因此，中国之封建制，也可以由突厥输入。

（四）我国“君”“郡”“县”三个与封建制度有关的用语，与西方语言有“相类之处”。

我们认为，这些论点和论据，都是错误的。

首先，我国西周初期，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这时，即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进入了封建社会的。突厥汗国（东、西突厥）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那是纪元后七、八世纪左右的事，与西周相距几达两千年，怎么能说西周的封建制度来自突厥？

周书突厥传：“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纳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又据通典边防篇结骨条：“其俗大率与突厥同。婚姻无财聘，性多淫佚，与外人通者不忌，男女杂处。每一姓，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因此：“突厥氏族部落在迁入吐鲁番盆地北山之时及其以前，仍然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女系氏族部落”^②突厥迁往北山，约在公元五世纪前叶，此时已约当中国南、北朝时代。岑先生认为我国西周初期就受突厥影响而产生封建制度，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岑先生认为突厥古制的节级分地就是封建制度，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称的封建制度，是指封建主在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依附的农民的基础上，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的基础，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而节级分地、土门使室点密治西亚，却只是突厥统治者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的和军事的统治方式而已，它并没有表现为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封建主对依附农民的封建剥削，因此，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并且，土门平服西亚，约当公元五世纪左右，更不可能影响西周。

我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在产生于何时这一点上至今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从突厥或任何其他国家输入的。它同样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结果。

既然如此，那么，岑先生所考定的“郡”“君”“县”与西方语言有相类之处，就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了。

四

岑先生认为：“突厥民族的上层建筑，与我国有许多相同或相类之点”。十多年来，岑先生在这方面发表了許多意见，他认为：我国古代对天和太阳的崇拜，如“指天设誓”及关于人殉、葬期等等；关于婚姻的如嫁奩、返娘家等等风俗习惯，都是由突厥传来的。其实，对天和自然的崇拜等习俗是原始社会人类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必然产物，各族人民的初期历史都有这样的记载，并非突厥所独有，也用不着从外族传来，这是稍具一点原始社会史或民族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的。

人殉，这是奴隶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人类还具有“灵魂不灭”的观念。除中国古代有人殉外，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多年巴比伦乌尔王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人殉。埃及没有人殉的发现，但巨大而精美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其他各族在奴隶制初期以俘虏为牺牲等等事实，也都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

嫁奩和返娘家的习俗，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出现的，也是生产力发展，私有财产产生后的产物。这种习俗，有些一直保留至今。我国的这类习俗，并非来自突厥更是显然明白的事。

这些都是属于常识的问题，兹不须一一详细论证。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世界各族人民，尽管有语言、血统、地域以至肤色的不同，但不论大小，

① “隋唐史”20页。

②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六节：“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制度”。

都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把各族人民普遍存在的事物（铜、铁的使用和封建制度的产生亦然），通通归之为突厥所创造的，其他各族都是受突厥影响而来的，那么，就无异于认为只有突厥族是最优秀的，这和种族主义的理論，正是不謀而合。

从以上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出，岑先生所謂中国古代文化来自突厥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我們知道：我們是世界著名的古国，在我国的土地上，早在几十万年以前，已有猿人在繁殖子孙，最后成为现代居民的祖先；我們能够創造光輝灿烂的古代文化，当然也是由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聰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結果。这是客观事实問題，是不容許抓住一些符合于自己假設的材料，以个别代替一般来抹杀的。自然，我們并不否認各族人民在文化、語言、血統以至生产技术等方面，能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但这和岑先生的說法沒有相同之处的。

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人类社会是遵循着共同

的客观规律发展的。我国社会在进入奴隶制以后，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結果，必然也要发展为封建社会。岑先生认为我国的封建制度甚至青銅和铁的冶炼技术都来自突厥，事实上就是否認我国社会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发展，否認我国劳动人民的独立創造能力，不仅对祖国文化采取了虛无主义态度，而且，夸大突厥对我国的影响，以外因代替内因，这当然是违背馬克思主义，违背历史的眞实面目的。解放以来，岑先生希望能以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对待中国历史的研究，这自然是我們所欢迎的，但要正确运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必須首先坚决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否則，如緣木求魚，一切都是徒劳的。不仅如此，还可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繼續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遺害青年学生。我們期待一切愿意在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走上紅专的道路，我們也以此期待于岑先生。

广州高等院校采用三結合方式編写教学大綱及講义

广州区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在去年双改运动时即着手編写新教学大綱和講义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去年十月左右，各校文科各系师生为貫徹党的教育方針，紛紛下乡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进行劳动鍛炼。在对党的教育方針进行大辯論，并經過劳动鍛炼，提高广大师生政治思想觉悟，統一認識的基础上，各校繼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并采取党的領導、教师和学生合作的三結合方式，編写了一批教学大綱和講义。如中山大学历史系在1958年12月中旬至1959年1月中旬在农村进行了一次教学改革，解决了主要专业課的教育思想問題。用三結合的方式，在过去“双改”所检查出来的問題的基础上，按照貫徹党的教育方針的要求，繼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集中力量深入检查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亚洲各国近代史”等十一門专业課程的講义講稿。在这个基础上，系的党和行政領導发动全系的师生（二、三、四、年級全体同学），自一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月一日，集中力量編写教学大綱和講义。一边討論，一边編写。計共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先秦至鴉片战争前）、“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史各門課程均系将原来的世界史課程与亚洲史課程合并編写）、“考古学通論”等七門主要专业課程，編出講义总字数約在三百五十万字左右。这些講义講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立场明确，問題鮮明。中山大学中文系也已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文艺学引論”、“汉文字学”等九門課程的教学大綱的編写工作，并正在編写講义。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采用三結合方式完成了有三十五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講义（初稿），其中有一部份已作出定稿并开始付印。历史政治系完成了政治經济学教学大綱的編写，目前正根据这个大綱正式授課。目前广东师范学院及暨南大学文科各系，正积极深入进行教学改革，采用三結合的办法組織力量检查各专业課程的教学，明确培养目标，确定原則，拟訂新的教学計劃，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編写教学大綱和講义。

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

阮 鏡 清

在现代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就是他们要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始终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在“学术”的幌子下来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以蒙蔽和模糊劳动人民的认识。这种事实表现在心理学上，最突出的是否认阶级存在，抹煞人的阶级性，从而在研究上极力反对、回避阶级分析。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他们尽力回避这种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代之以心理的观点，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学或心理社会学；对人的心理的解释，也是回避阶级分析观点，而代之以超阶级的生物学观点。这正是目前在全国掀起的对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中的主要内容。这里拟就个人的一些体会略谈几个问题。

—

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的心理，本来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阶级性在人的心理中是最本质的东西。人的心理既然有强烈的阶级性，所以必须贯彻阶级分析的观点，才能理解心理现象。但是这种阶级分析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所最害怕的。例如在有些心理学著作中描述人的心理特征时会客观主义地说：“有人自私自利，有人大公无私”。如果把这两种心理从阶级观点出发分析起来，到底那些人自私自利，那些人大公无私呢？这是很容易得到解答的。资产阶级当然知道实行这样的分析是对本阶级不利的，所以不能不极力加以回避，而以生物学的观点来代替阶级分析的观点。如什么生物学化，生理决定论，双重决定论，遗传论，本能论，实验心理学等等，都是这样被提出来的。

关于大脑的作用问题，资产阶级心理学者总是片面地加以夸大，要从大脑中找寻人的心理的原因。我们知道，大脑是一种自然物质，人的心理活动虽有赖于大脑这一自然物质去反映客观现实而发生，但对心理实质大脑并不起什么作用。试看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其大脑并没有什么差异；在同一性质的社会中，剥削阶级的大脑和被剥削阶级的更没有差异，但他们的心

理在其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对人的心理的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大脑，而是在大脑以外的社会关系。因为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要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人的实践又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阶级地位分不开的。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其实践固然不同，就是在同一性质的社会，不同阶级的实践也决不一样，他们在实践中由于社会生活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反映的内容也就各有差异了。这就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的心理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所关切的是怎样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怎样无限地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劳动人民所关切的却是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怎样改变本身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两者的心理有本质上的不同。又如现在在我国农村已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但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贫农、下中农和富农也是不同的，前者积极拥护，热烈参加，后者却千方百计加以反对。因此，人的心理，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不只是对认识对象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这就是人的心理的实质。

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人的大脑和心理的关系，因为大脑是心理的器官，有器官则有机能，大脑的机能就在于它能够反映客观现实这一点上。如果人没有了大脑，当然也就不可能反映客观现实。关于大脑如何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根据巴甫洛夫的研究，大家都承认高级神经活动，是心理的生理基础。不过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充其量也只能在心理发生的物质机制方面解决一些问题，至于对人的心理实质，却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什么有人自私自利，有人大公无私这样的问题，在人的高级神经活动中能找得出解释吗？当然不能。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心理学者却偏要把这种活动的作用夸大起来，企图用生理现象来解释人们的每一种心理，甚至有人这样说：“即使在一个人身上，由于当时脑内状况的不同，因而对同一刺激也有不同的反映”。

这显然是道地的唯心主义的生理决定論，同时也說明了他們是把人的心理现象降低为生物现象来处理，高級和低級等量齐观了。假如人的心理的原因，真如资产階級心理学者所說的是在于大脑，則心理学家只研究大脑就够了，用不着階級分析，而高級神經活动学說就似乎成为解决人的心理的唯一鑰匙。这样，階級观点、階級分析，在心理研究上的重大意义也就偷偷地被抽掉，从而把人的心理完全生物化了。不但如此，大脑的作用夸大了，則許多坏人做了許多坏事，都可以把原因推到大脑上去，甚至资产階級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进攻，反革命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也可以說成是因为“大脑皮質有問題”，而和人的階級立场无关了；至于思想改造也成为多余的，只在神經系統上改造旧的动力定型就够。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资产階級的心理学会把人們引导到如何詭譎的境地。这說穿了，不过是在巴甫洛夫学說的幌子下，处处用生理去解释心理，回避了階級分析，把人的社会性和階級内容抽掉，使人的心理生物化了。这种“学术”是为誰服务的，还不明显嗎？

二

资产階級心理学者又常拿出心理学應該研究心理形式（过程）这一主张来反对階級分析。他們認為心理形式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用不着階級分析。在他們看来，我們之所以要強調階級分析的观点，是由于我們只研究心理内容，而不研究心理形式。事实上我們固然着重研究心理内容，但也并不忽視形式的研究。不过我們認為形式是离不了内容的，二者的联系非常密切，不可能有沒有心理形式的心理内容，更不可能有沒有心理内容的心理形式。不論在認識过程上或在感情态度上都可以具体地看到这两者之間的联系，在一定的心理形式中，总是跟这个或那个心理内容相联系的。所以我們要研究心理形式，必須結合内容去研究。試就感觉知觉來說，人在感知过程中，必然感受一定的事物，必然跟其他心理过程和自己的意識傾向联系起来。意識傾向如果不同，則对于所感受的事物，也必然有不同的反映，不但認識不同，感情态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人們的面前插着一面紅旗，不同立场的人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感情和态度；工人階級和革命者会想到党，想到革命，想到斗争，想到胜利；而反动派則感到害怕，表示憎恨。如果說，在感知过程中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沒有内容，不跟人的意識发生联系，則我們只能

漠然感到一面旗子或一种紅色，甚至連这是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認識。这种现象就很难說是完整的心理现象了。这样看来，我們虽不否認人有共同的心理过程、形式，但另一方面，人又总是有意識的，而意識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在階級社会中又总是有階級性的，所以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如何去認識，認識了发生什么感情，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它，在不同階級出身、有不同意識傾向的人总是不同的。我們如果不結合内容，用階級观点加以分析，这些现象是无法从本質上理解的。

心理的形式和内容，不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而且是心理内容对形式起着决定作用，所以当我們讲到心理形式，不是指这个階級内容所决定的形式，就是指那个階級内容所决定的形式，沒有形式不受内容决定的。今年一月十三日广州市何济公药厂失火，共产党员向秀丽为了保卫工厂的安全，不計金属钠着火，自己奋不顾身，扑向烈火，进行搶救，虽然她身上着火了，从脚部烧到腹部，从腹部又烧得胸部，特别是她的一双手，由于拼命截止着火的酒精流向金属钠，几乎被烧焦了，但她还是坚持下去，直到全身着火，遍体烧伤，終於因伤重光荣牺牲。她在搶救时虽受极大的痛苦，进医院后也不大声呻吟叫痛，她所关心的倒是“金属钠沒有爆炸吧？工厂有什么損失？”，即使在剧痛中她考虑的还不是自己的伤情，而是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英雄的事迹，这种事迹从心理学上說明了什么呢？不是說明了人的階級意識傾向决定了心理过程，心理内容决定了心理形式嗎？有人說：“火烧到手就即刻收回来，这就是简单的反射动作，也是疼痛的感觉，这种现象既不因种族而异，也不因地理位置和文化程度而有所不同”。这种理論，在共产党员向秀丽的英雄事迹面前，不是完全破产了嗎？因此过去有些资产階級心理学者，只研究心理形式，不研究心理内容，或多研究形式，少研究内容，而在研究形式中，也是离开了对它决定性作用的階級意識傾向。这一切都說明了他們不外是想回避階級分析，以便从“学术”上为资产階級服务。

三

人的心理既然有鮮明的階級性，是在实践中由社会生活、階級地位所决定的，則研究人的心理时，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到社会实践——階級斗争实践和生产斗争实践中去研究。但资产階級心理学者因为要反对階級分析，而強調从生物学的观

点，超阶级地去研究人的心理，并且要离开人的心理内容去孤立地研究心理形式，因此就必然主张用所谓“客观的”心理分析方法，特别是主张用实验方法，采取静的隔离的态度，把人当作单纯的生物实体，关在脱离社会实际的实验室里去研究了。这样表面上虽说他们是在实验中研究人的心理，但实际上都是从事生理方面的研究，即使有些实验是属于心理方面的研究的，但由于脱离了社会实际，抛开了人的意识经验，实际上就好像生物学家在研究生命过程，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过程，化学家在研究化学过程一样进行纯自然的研究了。他们虽然得到了不少结果，也只能使人知道一个人在简单的情境当中如何感知，如何思想，如何动作，好象一个动物所表现的那样而已。至于人和人间的复杂现象、阶级关系等等，就茫然无所知了。

在实验中，资产阶级心理学者不一定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有些人还拿出很多时间去研究动物的心理，而企图用动物研究的结果去说明人的心理。例如在说明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时，就有人说单细胞动物有了感受性就产生了心理，没有神经的动物也能进行分析综合，然后又去说明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他们在分析人脑和动物脑的区别时，也仅从数量上、大小上、皱纹上去区别，并没有说明人脑是具有反映社会的意识的作用，从而事实上把人脑和动物脑等同起来。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人和动物在生物学范畴内虽有某种程度的共同点，有某种程度的共同规律，但人到底是社会性的，人的心理是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和其他动物是有着根本的质的差别的，因此把人的心理还原为较低阶段的动物心理去研究，甚至把从动物心理研究中得来的规律去说明人的心理。这就好象以前有些自然科学家要用单纯的物理化学规律去说明生物现象，或用生物学规律去说明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一样，都是唯心论的。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精确的实验。但问题在于实验室的实验不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心理学要为社会实践服务，主要方法应当是走出实验室，到社会实际中去，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研究。只有在我們深入到社会实际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去说明人的心理时，实验方法才能够结合实际用来搜集一些有用的资料。当然，这种实验也就是在阶级分析观点的指导下，为阶级分析方法服务的。

四

最后，还必须谈到心理学的性质和科学地位问题。

心理学到底属于那一种科学呢？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或是属于两种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呢？资产阶级心理学者是主张属于边缘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以前资产阶级心理学者中也有人主张过心理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可是，这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本来心理学的性质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但现在的問題，在于资产阶级心理学者为了要把心理学生物学化，为了要片面地研究心理形式，要强调实验方法，使心理学完全离开阶级分析的观点，因而拿出边缘科学的主张来做幌子。必须指出，照他们的意图，如果认定了心理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他们便大可借口“边缘”而着重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从而进行那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心理学”研究。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属性以及研究的目的性，决定着这门科学的性质。人的心理的社会本质和阶级内容以及心理学研究是为了社会实践的目的，决定了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心理学既然属于社会科学，则作为心理学的对象而言，应当是研究共产主义新人的心理面貌。我国心理学研究也应当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心理面貌为对象，找寻他们心理面貌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结合实际，以培养他们及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心理面貌。这里应当包括共产主义的心理品质、劳动心理、学习心理、保健心理各方面的研究，并应注意如何应用共产主义心理品质的影响去推动学习、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等的改进。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尽其最大作用，帮助党和政府去正确地教育广大人民，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此外，我国现在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还须继续改造。在劳动人民中，也还有一些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问题，在心理学的研究上似乎也不能忽视。这就是如何把非共产主义的心理面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心理面貌的问题。

怎样在我国建立新的心理学，把心理学引向马列主义的道路上，是今日我国心理学者首要的任务。但中国的心理学界，过去长期被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流派的思想统治着，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曾在心理学的讲台上放过毒素，如果不积极地彻底地对资产阶级心理学进行批判，新的心理学是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的。

第一部紅色“中国文学史”

——評北大中文系文学專門化55級集体編著的“中国文学史”

艾治平

(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十多个同学，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經過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写出来的第一部紅色“中国文学史”，和过去所有的文学史都截然不同。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色是：發揮了列宁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的論点，正确地去评价三千年來我国的文学遗产，闡述它們的发展过程；肯定民間文学是专家創作的伟大源泉，并对他們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就体系而言，在这以前所有的文学史都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科学体系。从资产階級专家們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出中国文学的发展規律，它所反映的客观实际，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产生的来龙去脉。虽不能說封建学者和资产階級学者在文学史的研究上，毫无用处，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摆列了許多个“作家列传”和考訂了某些事实而已。这部紅色“中国文学史”不同，作者們由始至終用一切信实可靠的材料鮮明地指出：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而民間文学和具有进步性的文人作品，形成了进步的人民文学，这，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在創作方法上，它則是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以具体的內容而論，它充滿着民主精神，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此相反的是：統治階級及其士大夫們的反动文学。这些作品是反现实主义或消极浪漫主义的；而其描述的內容，就不外是对封建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阿諛逢迎，以及頹废厌世，淫佚腐化等类貨色了。

紅色“中国文学史”另一个最基本的特色在于：著者們在评价文学时，准确地运用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則；并根据毛主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精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每个作家作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对人民有利，对社会是否起促进的作用，以此作为评价作品和作家的准則。同时还注意到：作家的生活道路和作品的創作情况是很复杂的，他們所处的历史条件也是很复杂的，同一作家的作品，常常浸透“民主性的精华”，又含蘊着“封建性的糟粕”；因此無論对属于人民的进步文学，或属于統治階級的反动文学，都不能简单地、粗暴地貼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而必須根据每一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去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我觉得：从总的方面看，这部紅色“中国文学史”所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正确的，科学的，因而也是令人信服的。

(二)

把民間文学摆在很重要的地位，是这部紅色“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卓越創见。在这个实际上反映出作者階級观点的問題上，五四时期，某些资产階級学者好象也注意过，但是他們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破除階級偏见，客观地給被他們視作“俗文学”的民間文学以正确评价；而另一些人則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现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們正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不仅創造了一切物质财富，并且創造了一切精神财富，大量丰富的民間文学，就正是在他們手里产生的。

千百年来对于我国第一部詩歌总集——“詩經”的研究上，人們始終沒有跳出这样一个窠臼：与其說他們承認这部伟大作品的不少篇“来自民間”，不如說是借此达到为統治階級“丑表功”的目的。一向资产階級学者們談得最起劲的不正是所謂“采詩”、“刪詩”等問題嗎？紅色“中国文学史”的著者們沒有在这上头兜圈子，他們別开生面地把“詩經”中“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和“小雅”的小部分作品，以及其他先秦典籍中保存的一些断章歌謠，称之为“周代民歌”，而从其思想性、艺术性

两方面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它与“接受民歌影响的文人詩歌汇合成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源头”。并認為：“我国民間文学一直按照周民歌那样的现实主义創作道路不断发展着丰富着”。于是，两汉乐府和以后有成就的大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莫不是沿着这条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下来的。

从同样的观点出发，著者以有力的事实——如“九歌”所祭的神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九歌”所用的乐器是民間俗乐所用的；“九歌”大都是恋歌等来証明：“‘九歌’是出现在屈原以前的一組民歌”，“它可能是經過文人修訂加工的，做这个工作的很可能就是屈原，但是應該說，其主要著作权属于人民”。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穎的創见：它既和那些認為“九歌”是屈原之作的人們不同，也和从王逸、朱熹以至胡适等資產階級學者認為的“九歌”是民歌的改作，在观点或論証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长时期来被人們“冷眼相看”的民間文学，或“其主要著作权属于人民”的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它們本来的面貌，重现出历史的真实！同时在这部书內，又以大量的篇幅講述了魏晉散见于史书里面的民歌民謠，宋元民間歌謠，宋民間詞，明清民歌，鴉片战争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这些虽不完全是“新发现”，但在过去不是被弃之如敝屣，就是被歪曲，被誤解，只有到现在，它們——各个时期的民間文学，才如一顆顆巨大的明星，閃耀出絢麗的光輝！

(三)

三千年来的中国文学，真是浩若烟海，如果不在論述上有所詳略，那么，不仅篇帙浩繁，而且将会給人以臃腫堆砌之感。可是如何剪裁得当，这的确是个大問題。但由于編著者們掌握住了作品所反映出的对人民的态度及其思想艺术价值这一准则，而作到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有一般的敘述。这样，它一方面使讀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完整概念，同时又使讀者認識到，哪些东西才是我們應該珍視的可貴的遺產。比如在論述“詩經”时，着重地談属于人民創作的“风”、“雅”，而簡略地介紹一下歌功頌德的庙堂乐歌。讲到两汉，魏晉南北朝文学，則用大量篇幅分析了“揭露統治者胁迫民間妇女的丑行，并表现了人民理想中的女性如何以高度的智慧抗拒了这种胁迫的詩篇”的“陌上桑”；杰出的长篇敘事詩——“孔雀东南飞”；以及热情

地歌頌了聪明勇敢的女英雄木兰的“木兰詩”。可是，对于过去被許多文学史家褒扬的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班固的“两都賦”，张衡的“两京賦”等，却只花三、五行字，輕輕两笔，一掠而过，十分干淨俐落！同样，談明清小說时，对于“不是一人一时一次写成，而是无数人多年集体創作的結晶”的伟大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水滸传”、“西湘記”以及“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編著者却不厌其詳地从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思想內容、和艺术形象各个方面，来进行仔細認真的分析；对那些才子佳人式的恋爱小說，論述当然很少了。这种階級观点鮮明的敘述方法，为讀者清楚地指明了哪些文学遺產是我們應該繼承的，对我国今后文学发展有所裨益的；而哪些东西則是用处不大，甚至可以扬弃的糟粕。

紅色“中国文学史”的著者們，在論述作品上，既掌握了“重点突出”兼及一般的办法，对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些严重的謬誤现象，还进行了批判。比如关于屈原的研究，著者們肯定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代表了无产階級的方向；同时严厉地批判了游国恩等人的謊謬见解。論述李白时，著者們指出：以林庚为代表，把李白說成是“盛唐气象”的代表詩人，“夸大布衣的作用，实质上是表现了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超階級的观点”；以刘大杰为代表，把李白說成是“天才、詩人、神仙、豪俠、隱士、酒徒、流浪者、政治家的总汇”，不从階級观点去作分析，实质上是對李白的一种歪曲。論述“紅樓夢”时，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进行了簡炼而精辟的分析。总之，著者們在論述古典文学作品当中，鮮明地表现出：他們不仅要“立”，要插紅旗；并且还要“破”，要拔白旗；我觉得这项不可偏废、只能并举的战斗任务，北大中文系三十多位同学是較好地完成了。

(四)

用“持論公允，见解新穎”这八个字，或者可以概括著者对作家、作品所进行的闡释工作吧。年輕的北大中文系同學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对伟大作家、作品严肃認真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議論頗多的陶淵明、苏軾、王安石等，表示出較为公允的看法。比如，著者們認為：把陶淵明打扮成一个任真由性的人物，好象他的一切作为都由性情决定；或者把陶淵明打扮成一个飘飘然超然物外的“仙人”，再加

以欣賞；都是沒有社會觀點、階級觀點的看法，因之是錯誤的，是莫大的歪曲。著者們既肯定了陶淵明那種可貴的積極思想，並批判了他那種樂天安命、隨順自然、委運任化的消極思想。蘇東坡是千百年來群眾愛戴的一位文學家，可是在政治上，由於他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人們對他也是嘖有煩言的。這是一個矛盾。過去的文學史家們，不是避開他的政治立場，只談藝術；就是連他的藝術也採取抹殺的態度。現在本書著者們提出了這樣一種中肯、獨創的見解，他們認為：“蘇軾是一位愛人民的作家，對人民的苦難他是同情的，憤懣不平的”。不過，他沒有真正與人民站在一起，“只是從‘清官’的立場來觀察人民生活而已”。這種決不採取“貼標籤”的簡單化的辦法，而是出之於認真地分析研究總結出來的意見，也是最有說服力的。

另外，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這個時期——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來的“中國文學史”都是個空白，但這部紅色“中國文學史”用大量豐富的材料，作了分析，闡述，給填充上了。其他，如正確指出：杜甫、白居易可與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並列；關漢卿的作品比莎士比亞多一倍；“三國演義”、“西廡記”、“紅樓夢”等可與世界第一流文學媲美；從而證明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著者們又對中國文學受印度文學影響的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闡述。因此，打掉了長期來在某些“中國文學史中”流露出的民族虛無主義論調和自卑感。著者們這種努力，也是很有意義的。

（五）

上面，根據個人一些感受，我簡略地介紹了紅色“中國文學史”在幾個主要方面的成就。那麼，是不是說這部書就盡善盡美了呢？不，我覺得有些

地方是還可作進一步探討的：

這部著作表明：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鬥爭的歷史，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以文學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流派來衡量某一作家時，情況的確很複雜；是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既不是現實主義就是反現實主義。比如對於謝朓，著者們雖然承認他大部分作品沒有玄言哲理概念，創作了一些“情景交融，清新朴素”的山水詩；但是又以他的作品“沒有社會內容”，而說是反現實主義的。這種看法恐怕就值得商榷。

另外，這部書對變文的評價似乎高了些。變文自然是一種較通俗的文体，為人民所喜愛；可是就其內容來看，宣傳封建迷信——尤其是佛教思想，是相當強烈的。如“目蓮變文”、“降魔變文”等，恐怕還不值得完全肯定，前者雖也反映了些現實，但封建迷信色彩很濃厚。可是相反，对被著者們稱為反現實主義作品的“琵琶記”，我倒覺得否定過多了。其他不論，就是單就群眾對這部作品的喜愛程度說，也是和它差不多同時期的“荆（荆釵記）、劉（白名記）、拜（拜月亭）、杀（杀狗記）”所決難比擬的了——然而著者們却給了這“舊稱明初四大傳奇”以相當高的評價。

長達七十七萬餘字的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紅色“中國文學史”，是眾所公認的獲得了重大成就的一部成功之作。雖然還不能說它已經完滿無缺，而且事實上確實也還有一些地方有待進一步商榷和探討。

可是不管怎樣，總是“瑕不掩瑜”，那些我們認為還不足之處，比起這部著作的成就來，是決不能“等量齊觀”的。

（二月五日，深夜，於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工農理論學習叢書”多種

廣東人民出版社為了配合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於去年下半年出版了一套“工農理論學習叢書”，其中由工農群眾自己寫的有“我們是這樣學習哲學的”、“廣州造紙廠工人學哲學講哲學用哲學”、“番禺南村農民學理論的經驗”和“番禺南村農民論文選”等四種。這些著作詳細地、生動地介紹了廣州中一煙廠、廣州造紙廠的工人，和番禺南村的農民的学习情況和經驗。

這套叢書的主要特點，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既有觀點，又有材料，不作空洞抽象的議論，而用事實來說明和分析問題。因而，這套叢書的發行，受到了讀者的普遍歡迎。（朱一農）



短论与随笔

大小之間

何家言

事物的大小，是对立的，又是統一的。大事可以化小，因小可以失大，大小之間，既有所別，又可相通；必須用辯證的观点来对待事物的大小問題。可是有些人却把事物的大小絕對化、机械化，在大小之間筑起一道万里长城。这样，他們在对待具体事物的时候，要不是见大不见小，抓大不抓小，就是见小不见大，抓小不抓大。前者把一切小事情，小問題，小东西都排斥于自己的視野之外，认为这些都不值一顧，或者不值得自己去为之操心。

后者則把自己淹沒于小事情，小問題，小东西的海洋，脫不得身，变成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

正因为事物的大小，有其对立的一面，我們才提倡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鼠目寸光。但是，又因为事物的大小，有其統一的一面，我們就不能絕對地、机械地排斥一切小事情，小問題，小东西。

不过，当我们处于革命事业和建設事业已經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許多重大的問題已經胜利地或基本地解决了的当前形势之下，我們就更加要在管好大的和抓好大的同时，对許多小事情，小問題，小东西也好好地管一下、抓一下。比如：

如何組織和动员群众，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这是大事情，一定要时刻注意。但是，群众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象毛主席所說的“柴米油盐問題”，以至“木桥太小会跌倒人”之类的小事情，也不能忽視。因为这些問題虽小，却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往往与一些重大問題有关。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必須使广大群众从这些小事情出发，了解我們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接受我們的政治号召。为什么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会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呢？原来从这些小事情上面，“可以使广大群众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在我們实践中，有无数的事实足以說明这个大小相通的真理——那个地区的干部，不仅在大問題上关心群众，而且在小問題上滿足群众的实际需要，那个地区的重大任务就完成得更好；那个地区的干部，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問題，不管也不抓，那个地区的群众干劲就鼓不起来，鼓起来了也难以持久，当然重大任务也就完成得不好。可见因小可以致大，也可以失大。

在商品的生产 and 供应問題上，从作为生产資料的拖拉机、大汽船到全套机器設備，从作为生活資料的粮食、衣料到住宅区的建筑，可以說都是商品生产和供应中的大問題，是必須抓好的；但是，不能认为只抓好这些大商品的生产 and 供应，問題就解决了。有許多小商品，小到象一針一綫，一个飯鍋，一把扫帚，如果不同时解决，也会造成生产上和生活中的諸多不便。沒有針綫，有了衣料也做不成服装，有了粮食，沒有飯鍋也煮不成飯，有了住宅，沒有把帚，清洁卫生会弄得一場糊涂。生活上的这些不便，又会影响人們生产的积极性。可见商品虽小，关系頗大，也是不能见大不见小，抓大不抓小。

一季、一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远景规划，可以說都是大計劃，肯定是很需要的。沒有这种包括較長時間的大計劃，干工作，搞生产，就沒有一个長远的或比較長远的打算，走一步见一步的近視眼，是不可能把工作、生产搞好的。但是，只有大計劃，沒有半月、十天、一周的小段計劃，或者沒有各个具体单位的小計劃，大計劃的实现，又会失去可靠的保証，大計劃会变成空計劃。江苏省吳县望亭公社在整頓經營管理工作中，为这个大小之間的辯證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証据。这个公社因为推广了根据大計劃制訂小段計劃的办法，对完成大計劃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也用順口溜道出这个辯證关系：“小段計劃不排好，当天生产不知道；小段計劃訂出来，天天农活做周到。”实践証明：每个小段計劃的完成，是完成阶段（季度）計劃的可靠保証，这叫做“抓住小計劃，实现大計劃”。可见，这大小之間，也是相通的。

以辯證的观点来对待事物的大小，就能够见大又见小，抓大又抓小，因而，可以因小致大，这是尊重辯證法的結果。相反，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事物的大小，就会是见大不见小，抓大不抓小，因而，可能因小失大，这是违反辯證法的結果。

看来，我們还是應該多学点辯證法，一刻也別忘記用辯證的观点来对待和处理一切事物。

看来，我們还是應該多学点辯證法，一刻也別忘記用辯證的观点来对待和处理一切事物。

迷信与科学

夏 枫

迷信与科学是相互对立的。有迷信就必然排斥科学，要科学就必须破除迷信。

科学是人类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它能正确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懂得了科学，就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来思想、生活、工作，以至运用它来改造世界。迷信则相反，它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它使人们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用某种主观臆造的成见对待思想、生活、工作问题。我们提倡破除迷信，就是要使人们从某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臆造的成见、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党和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目的就在于此。在这个号召下，全国人民建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这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在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大跃进中，有着不胜枚举的人所共见的事例。比如，过去人们被粮食生产增长的速率每年只可能达到百分之几这个成见束缚着，于是，谁也不敢设想向土地要更多的粮食，因而多少年来都安于较低速率增长的现状。但一经破除了迷信，树立了科学观点，认真贯彻毛主席根据科学原理提出来的“八字宪法”，我国粮食增长的比率就不是以百分之几来计算，而是以倍数来计算了。又如，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专家和教授才能研究科学、编写讲义，青年、学生则谁也不敢问津。这也是迷信。当青年、学生破除了迷信，认识了科学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深不可测的东西，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集体的智慧，也能够攀登科学的高峰。而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证人。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的力量，编写出了质量较高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再如过去被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似乎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漫说是劳动人民，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由于这种迷信而被剥夺了学哲学的权利。可是，当工人农民破除了迷信，剥开了被人们有意无意披上去的神秘的外衣之后，哲学就回了老家，事实也证明了工人农民不但能学哲学，而且学得很好。不仅能学而且能运用它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推动生产。所有这些，不正好证

明：有了迷信，就没有科学，有了科学，就破除迷信这一真理吗？所以，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科学是不应该也不能破除的。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更不能无视客观规律。

或曰：你这话不对，有时科学也能破除，而且事实上也已经有人把某些科学破除了。例子是：过去的医学文献认定一个人被灼伤的面积超过百分之七十就很难挽救，而超过百分之八十就必定死亡，这是科学的临床实验证明了的，但是上海工人丘财康被铁水灼伤面积达89.3%，上海的医生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之下，结果挽救了丘财康的生命；这不是科学也可以破除吗？不错，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但这是被破除的仍然是迷信而不是科学。因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得不多不深到知得更多更深，逐步全面完整起来的。因而科学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发展的。以上述的例子来说，过去文献上的病例，是在当时对于客观事物认识的一定限度上实验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不可逾越的教条，那就是违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迷信。只有破除了这个迷信冲破这种教条的束缚，认识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现代医学水平日益提高的条件下，进一步找出致死的原因，是有可能打破过去的成见，挽救伤势更重的病人的。上海的医生在党的鼓舞和支持下就是这样破除了迷信，从科学观点出发，研究了病人休克期死亡的原因，发现了是绿脓杆菌所致，还有其他等等。找出了原因就加强了治疗信心，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医务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挽救了丘财康，使医学这门科学在这一方面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当然，在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过程中，也可能有个别的人在破除迷信时，连同科学一脚踢掉。这也是应该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破除一切违反客观规律的束缚着人们思想、生活、工作的唯心主义的成规、教条，树立科学观点，运用科学方法去处理一切事物。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破除迷信。凡是迷信必须彻底破除。但同时也反对否认事物的客观规律，不顾任何客观条件，海阔天空，脱离实际的幻想。因为它实际上恰恰是陷入另一种迷信而否定了科学。



关于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問題的一些看法

一、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

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样是社会分工的結果。在原始社会里是沒有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大家一同打猎采野果，都参加生产劳动。当时的生产力很低，人們的劳动的产品除了勉强維持最迫切的需要以外，不能創造任何剩余产品，因而不可能有人不劳而获；那时工具的改良和发明，也是在生产劳动中进行的，沒有單純的腦力劳动者，因此那时沒有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的分別。直到階級社会出現，即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們的劳动提供了多于維持生命以外的某些剩余产品，这就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不劳动靠剝削来生活。統治階級依靠剝削劳动人民来过活，他們不劳而食，脱离了生产劳动，于是出現了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对立关系。剝削階級中有一部分人，不参加生产劳动，專門从事政治、文化艺术活动，高高在上，統治和压迫劳动人民，这就形成了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的对立。剝削者不劳动而食，自然引起人們的不滿，于是他們就編出了“社会分工”，“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應該从事不同的工作”等鬼話去騙人，企图平息人們的憤怒，后来花样就越来越多了。

在階級社会里，統治者为了維持和巩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就要极力貶低劳动人民，抬高自己，于是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論調。这是很自然的，在剝削制度下，只有剝削階級才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才有資格“劳心”；而劳动人民却沒有讀書的权利，只能“劳力”，这样，劳动人民似乎就應該永远受治于人，低人一等、被人残踏了，而剝削者却似乎應該可以永远統治人民、騎在人民头上了。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教育、哲学、风俗等与其經濟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是为这个剝削制度服务的。那时，誰的剝削本領高，誰最有錢誰也就最体面、最高貴、最配称得上是人上人。而当时的教育，也主

要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讀書、埋头在紙堆里的奴才帮凶。这些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却把书本知識吹噓为万能，事实上他們有了这些已足够以此来吓唬人，来作为統治人民的資本；至于生产劳动，却說成是下賤人干的事，劳动生产的本領，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在社会上凡是高官厚祿，威风凜凜的人，多是腦力劳动者，而劳动人民終年辛苦劳动而不能溫飽，看来讀書人确是高人一等了。在这些伪装美化下，不少人被欺騙了。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产生体力与腦力劳动的对立的剝削制度的經濟基础早已被埋葬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到那时，人人普遍受高等教育，人人是工人也是工程师，是多面手；更由于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根本也分不出什么是体力劳动，什么是腦力劳动了，因此那时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的差別沒有了。如果說那时还有人干那样那样工作的不同，那只是社会的分工，他們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是完全平等的，彼此和諧地互相协作。

二、关于按劳取酬的問題

按劳取酬，这确是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不相容的，它是资产階級法权的残余表现之一，但公正地說，在社会主义建設某个阶段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产階級的腐坏上，共产主义建設是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在过渡时期还是需要采取折衷的办法的，因为既然沒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条件，也不能沿用资产階級那一套分配原則。提出按劳取酬，不劳者不得食，是抵制住了资产階級的不劳而食的剝削思想，起了积极作用。按劳取酬的原意是鼓励人們积极劳动，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結合起来，防止了一些懶汉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得。但是有些人以资产階級思想，歪曲了这句话的原意，要按酬付劳，一切看在“酬”字上，一分錢一分貨，斤斤計較个人利益，为了多得才多劳。这在專門从事腦力劳动的知識分子中，还是一个存在着的問題。

有人从个人主义出发片面强调按劳付酬这个分配原则，他们说：“我本领大，才能高，比别人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酬自然要比别人多。”不用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的确，在旧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专家，是用他们父母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多数是靠剥削劳动人民）赚来的金钱投资培养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完全否认，但认真深究一下，便会看出，其实一个人的才能本领是社会集体，主要是劳动人民教育培养出来的。他这个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他是从社会中许多人养活和用社会的力量培养出来的，因此人的才能的社会化与才能的个人占有化是一个矛盾（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支配这种才能），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与商品的私人占有制矛盾是一样的。这矛盾必须求得合理的解决。在公有制的社会里，作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们自己，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矛盾呢？难道还应该

认为，个人的才能可以作为奇货待价而沽么？在今后，要是他还把个人本领囤积起来待价而沽，事实上也再没有市场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目前我们还不能不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出发来片面理解这个分配原则。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要看清楚按劳分配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在今后，人们的才能还是有差别的。由于工作的需要，工作岗位也有不同的，那是社会的分工，完全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了。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实行按劳取酬，但这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必须认识，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以便将来逐步用按需分配来代替按劳分配的原则。

（广州回龙路小学教师 余璜）

我看到了农民学习哲学的好处

去年十月，我下放到东莞县石碣营参加劳动锻炼，在那里住了二个月。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学习了农民兄弟许多优点和高贵品质。

最使我感动的是石碣营的农民兄弟们在繁忙生产季节中，还坚持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寻找解决生产中存在问题的思想武器，使生产工作做得更好。

农民兄弟们学习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理论认识，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学习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提出生产中的问题，再到毛主席的著作中找理论根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回到生产中去指导实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到实践的学习方法，很受农民欢迎。

在繁忙的秋收季节中，这个营的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形成高潮。为了使这一学习更好的开展，县委宣传部派了三位同志帮助农民学理论，我们几位大学生也协助进行这一工作，编了一部通俗的“矛盾论”教材。

学习的高潮从11月8日开始，从青少年到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都参加学习，占全营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利用休息和饭后时间在田头和饭堂上课。在学习中培养了农民讲师二十二名，由这些农民讲师和连营以上干部分头到田头、饭堂去讲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事例解释教材，并根据当前生产中存在的矛盾，加以分

析，提出解决办法，再让大家揭发和讨论。参加学哲学的社员通过对矛盾的分析，认识到当前农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是：秋收进度缓慢和时间紧迫工作任务多不相适应。找到了主要矛盾，便分析其原因，发现许多搞副业生产的人没有暂时服从大需要，加入秋收队伍，同时大家的干劲还未全部发挥出来。干部综合了社员意见后，立即从搞副业的人中抽出三十人，收割黄麻的人中抽出二十人，并把街坊居民全部动员起来，投入秋收战斗；同时还在全营各连中开展秋收速度竞赛，这样很快就形成了秋收生产的高潮，如十一月九日，全营只割禾一百一十亩，十日就增至二百八十亩，十一日又升至三百零五亩。广大的农民在开展生产竞赛中，干劲冲天，采取各种措施，加快秋收进度，青年农民袁康有割禾伤手，流血很多，大家都劝他休息，他坚持不肯下火线。

十一月中旬，该营又转入学习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形成一个笑谈纸老虎的生动场面。

由于农民兄弟们在繁忙的生产季节里，坚持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取得巨大的成绩。因此，在十一月下旬的东莞县和增城县评比中，该营获得了文化宣传工作的上游营。

（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 黄义祥）

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問題的討論

(資料)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全国各地杂志，发表文章討論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以及如何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問題，对上述問題的看法都有分歧。我們把各种不同意見綜述如下，供同志們在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时的参考。

——編者

一、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 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第一种意見：少数同志認為公社的范围扩大到县，不管是县社或县联社都已經是全民所有制的了，它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內部“大公”和“小公”的关系。

有的同志比上述意見更进了一步：認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不管是那一級，是一乡一社、一乡数社、县社或县联社，都已經是全民化了。

他們的理由綜合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公社化以后，个人消費基金的分配，一般都实行了半供給半工資的分配制度，公社的收入同分配給社員的消費基金已經开始游离。不但一个公社內原来有貧富之分的各农业社社員个人消費水平被拉平了，而且在各乡公社之間也开始靠攏，这表示乡人民公社消費基金已經相当程度上的全民化；（二）公共积累部分的分配，在組成县社或县联社后，起了一定質的变化。公共积累已不限于用在本社，已可按照“四个并举”方針下的全民要求，用在本社、本县以至本专区。这样，公社公共积累的分配就突破了原来的框子，对各乡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决定关系；（三）公社化后，农民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可以由国家来直接計劃和安排，不仅对粮食、棉花等生产如此，对鋼鐵生产也是如此；（四）从公社交换关系来看，公社化后，国家和人民公社的購銷关系，不仅更集中了，而且向全民化前进得比較远；（五）公社化后，各乡、县公社在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基础上，开展了共产主义大协作运动，如集中主要劳力、不計報酬地搞大型水利，互相支援，以及按全民要求大搞鋼鐵“小土群”等等，这些都是超出集体所有制的表現。（六）并社轉公社，在所有制性質轉化上，是

没有什么过渡的，也用不着經過一定的过程。只要公社建立、实行供給制，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那么，集体所有制就必然被否定，而代之以更高級的全民所有制了。

第二种意見：多数同志和上述看法相反，認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但在所有人民公社內部都已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因素（或成分）。他們列举出許多理由来論証目前人民公社（包括县社、县联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这些理由綜合起来是：（一）当前人民公社，在建社过程中合并起来的生产資料，如土地、农业机械、农业工具、耕畜等等，以及人民公社的产品，仍然是公社集体所有，由公社直接支配，国家不能自由使用和調拨；（二）公社的生产計劃还未直接納入国家計劃，国家計劃对公社的領導是間接的，国家对待公社的計劃并不如对待国营經濟那样，从生产指标、定額、投資、劳力安排、产品銷售都由国家計劃决定。现在国家对公社仍只能提出大体要求，生产的具体規划，如資金积累、劳力安排等都由公社自己解决；（三）公社总收入的分配中，以农业稅等形式上繳国家，由国家直接支配的农产品，只占公社总产品（总收入）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仍由公社自己支配；（四）公社化后，分配方面的确发生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如个人消費基金和公积金可以在公社內进行調剂，但仍以全社統一計算盈亏，沒有超越一个社的狭小范围；（五）虽然目前农产品購銷关系、方式有某些改变，但除农业稅等实物稅外，国家和公社的物资交换仍然是商品交换，而不能馬上过渡到由国家統一調拨；（六）各公社的消費水平主要还是由各公社的生产水平所决定，而全国各地、各个公社在目前条件下，生产水平极不一致，因而消費水平也相差悬殊。認為个人消費基金与公社收入“游离”了，公

社收入高低对社員个人消費基金影响很淡薄了，这是一种不符事实的說法；（七）共产主义协作是我国大跃进以来一种比較突出的共产主义方式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些共产主义协作还不足以說明全民所有制的标志。因为协作在个体經濟时代、互助組、合作社时代都存在过，能不能說那时就已經全民化了呢；（八）公社发展到县社或县联社就是全民所有制这种观点的錯誤，是把县社或县联社作为全民所有制的界綫。誰都知道县是一个地方而不是全国。全民是指一个国家內的全体人民，全民所有是指生产資料和产品都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显然当前县公社或县联社，其生产資料和产品都不是属于全民所有；（九）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需要經過一定的过程的。因为公社才在昨天成立起来，有些干部和群众对什么是公社的問題，还未完全了然，同时生产底子又那么薄，尽管人民公社的发展很快，“一天等于二十年”，也不会在一夜之間突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还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需要的条件来反証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質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認為全民所有制至少应具备有下列一些主要特点：（一）生产資料为国家所有，国家可以按照全民的要求来組織公社的生产，支配和調拨公社的生产資料；（二）公社所生产的产品为国家所有，成为国家的财产，国家可以按全民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来支配和調拨这些产品；（三）公社扩大再生产的資金，由国家負責拨給；（四）公社社員的工資由国家发給，全国统一工資标准（当然是考虑到地区差別在內）。目前來說，絕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仍未具备这些特点，所以虽然它具有許多全民所有制因素，但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

第三种意見：有人說目前农村人民公社既不是集体所有制也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介乎两者之間的既有集体所有制因素又有全民所有制因素。

有人反駁这种意見，認為这种半集体所有制半全民所有制的看法，是一种对现实缺乏具体分析的籠統的說法。从发展上来看，两种所有制的比重，会有消长的轉化，但目前从全国來說，还不能說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成分已經达到了50%的程度。

此外，应当怎样研究分析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根据什么来确定所有制性質才符合于馬列主义的观点問題，在討論中也有不同意見：

認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已經全民化了的同志，他們的方法是分配、交換入手进行研究

的。他們說：这里的問題既不是較易区分的公有私有問題，也不是一种敌对經濟的和平改造問題，而是集体公有經濟已經轉化为何种状态、何种程度的全民公有經濟的問題。……从生产資料的占有关系去看，虽然也能看出它底一点变化，但是这不足以反映出它底全部变化。因此，必須分析原来以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社在公社化后和生产繼續发展、群众觉悟繼續提高以后，它底生产特别是它底分配和交換关系究竟起了何种变化，借以反映出人民公社已是何种性質的所有制。

与此相反，認為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同志，不同意上述分析方法。他們認為这种撇开占有关系不提，单从分配、交換关系的变化来“逆进去”論証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的方法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認為，生产資料的占有和产品占有，是决定所有制最根本的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在研究所有制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是生产，是生产結構中的占有关系。所謂占有关系，一个是生产資料的占有，一个是产品占有。生产資料和产品占有关系，决定分配和交換的关系，决定所有制，决定人民公社的性質。因此，我們研究所有制性質必須从占有关系出发，而不能从分配、交換出发，由此“逆进去”窺察占有关系，决定所有制性質。不談占有，只以分配、交換和协作去决定所有制，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顛倒的，是“分配决定論”，是离开馬列主义的。

二、关于集体所有制怎样轉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問題

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在什么条件下就可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情况下轉变为全民所有制最有利？对这个問題也有不同看法：

关于过渡的条件問題。

第一种意見：少数人認為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主要条件有两个：（一）国家能够支配公社的公共积累；（二）公社社員的收入水平能大体統一起来。“这样，人民公社就在实质上轉变为全民所有制了。

第二种意見：多数同志不同意上述看法，認為分配問題虽然也是很重要的問題，但分配关系是整个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关系任何一种变革，都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脱离生产而強調分配是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主要条件，是违背馬列主义根本原則和客观經濟发展规律的。

部分同志認為要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

制，其主要条件应当是：（一）人民公社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创造出丰富产品，使国家有可能达到对生产和消费初步包下来的程度；（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同时在相当大范围内已可以作到大体上接近；（三）社员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克服了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

还有的同志认为从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在物质条件方面有三个标志：一是个人消费品实行全民性分配；二是公社生产资料基本上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是商品交换有了高度的发展。精神条件方面也有三个标志：一是在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的基础上，“四化”有更加完善的高度的发展；二是农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三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根本解决。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在很大程度上达到共产主义化。我们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群众共产主义思想，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积极创造条件。

关于在什么情况下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最有利的問題。

第一种意见：少数人认为人民公社不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提早过渡会比较有利。他们的理由：（一）时机成熟了。去年的大丰收如果不把它作为开始全民化的物质依据，那就会被人用来加深各社之间的集体所有制界限，加深贫富之间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增加以后全民化的障碍；（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党指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好处，农民群众就会坚决拥护而乐于接受。因此，主张应该“不断革命”，“抓紧时机”，及时行动实现全民所有制，“迟插手不如早插手更为主动”。

第二种意见：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过早地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会不利于生产大跃进。有些同志提出：从生产上来看，如果立即把公社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社的产品也象国营企业一样，由国家来分配，过早地把商品交换变为产品交换，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公社都伸手向国家要生产资料，这在国家为社会需要而掌握的产品还

不丰富的情况下，是办不到的事情，勉强去做，就会分散资金，减缓生产力发展速度。一是在公社之间，全面“抽肥补瘦”，就会伤害一部分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性，同样会减缓生产力发展速度。从消费方面来看，现在公社之间消费水平高低悬殊，如果现在就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各社之间消费水平就要大体相平，或者是国家拿出一部分消费品“填平补齐”，这有困难，也不能这么做。或者是各公社之间“抽肥补瘦”，就会使某些公社社员生活水平下降很多，而另一些得到提高的公社，还觉得是“杯水车薪”。这就会伤害一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就是一种危险。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迟插手不如早插手主动些”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五亿农民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是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后前进的速度也主要是以此为转移。不可能离开这些基础，更不能认为只要“国家早插手”就能早解决问题。正是这个理由，国家不能要求各公社“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只能准备条件，逐步过渡。

还有的同志认为，那种把“不断革命”论，作为“提早过渡”、“及时行动”的理论基础的認識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不断革命”，就只能“提早”不能“有快有慢”；只能“及时”，不能“有先有后”；只能“一步登天”，不能“逐步过渡”。这就把不断革命论作了庸俗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把“不断革命”和“逐步过渡”作了对立的理解。忘记了两个革命之间往往有个转变过程，一个革命进行之际也往往有个发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准备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使革命逐步走向深入的。至于说到只要党指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好处，农民就会坚决拥护而乐于接受的问题。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觉悟，亦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是具有决定意义。但它必须依靠经济发展的客观法则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使它们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广州举行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座談会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州哲学学会、广东經济学会最近在广州联合举行了两次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座談会。参加座談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教师、理論教育工作者、报刊編輯和广东省人委直属机关干部。座談会上爭論的焦点是关于“过渡”的起点問題，根据座談会的发言，归納起来基本上有四种意見：

第一种意見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才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意見的主要論点是：（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质的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理解为从量变到根本质变，它包括着經济、政治、思想意識等全面的质变。只有在建成社会主义后，当新质占統治的支配的地位时，才发生这种从旧质到新的飞跃，才开始这一“过渡”；（二）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須在条件成熟之后才开始。六中全会“決議”所規定的六条（“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见“決議”文件第十八段），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大致相同，可见要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才开始这一“过渡”；（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作为革命的战略任务来理解，这一任务要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才能提出。

第二种意見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必等到社会主义建成后才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同时，只要条件成熟就可以开始“过渡”，这种意見的主要論点是：（一）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只要条件成熟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国人民公社这一形式以及公社化以后普遍出現的共产主义因素，将加速我国向共产主义过渡；（二）社会主义已經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国际形势对我们特別有利，我們可以利用有利条件，通过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的“高級形式”的协作，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只要“过渡”的条件成熟，就可以提出“过渡”的任务；（三）六中全会決議已具体規定开始“过渡”的条件，这些开始“过渡”的条件（即上面引的六条），同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逐条比較，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条件有可能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就逐步成熟起来，这就說明我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前。

第三种意見认为：人民公社化的全面实现标志着“过渡”的开始。主要理由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漸成长代替旧质要素来实现的，公社化的全面实现，出现了若干明显的、具有标志性的共产主义的新质要素，这說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质变过程的开始，也就是“过渡”的开始。

第四种意見认为：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标志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因为到了那时，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之間差別基本上消除；生产力也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符合決議所指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精神。

討論中还涉及对“过渡”的概念的理解問題；“开始过渡”和“过渡到”的區別問題；“党的战略任务”与“社会发展規律”的关系問題等。但所有发言的同志，都一致肯定：我国人民現阶段的任务，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不能把建設社会主义和建設共产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

經過热烈的爭論，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見，但多数人认为：我国现在还不具备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因此，不能以人民公社化作为开始过渡的标志。

会上要求大家認真学习六中全会的文件，正确理解文件的精神，从理論上和思想上提高認識水平，以便更好地貫徹执行六中全会的決議。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特別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特別欢迎闡明毛澤东同志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学习心得等稿件。
2. 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要求尽量精簡，一般不超过六千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征集1840—1949年广东人民革命 斗争史迹照片、图片启事

我們正在編輯一套“1840—1949年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为了使这套图片集的内容更丰富和更全面，希收藏有关下列资料的机关团体或个人，能支持这一工作。

凡有关广东近代、现代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和少数民族等）的照片、图表或其他有关文物，均在征集之列，特别需要下述各项：

（一）两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及团练局领导的反英斗争的。

（二）太平天国前后，广东人民的反清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其余部在广东的奋战和天地会的斗争的。

（三）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支持。

（四）五四运动、党的成立时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五）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抗日组织及其斗争。

（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解放区军民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和反动“围剿”。粤赣湘、闽粤赣、粤桂等边区纵队的斗争。大军南下及广东各地的相继解放。

以上照片、图表等请径寄广州越秀北路222号本所历史室。如为私人收藏，要求复制后归还或保密的，可附说明寄来，我们保证妥善处理和保存。采用的照片、图表，酌予报酬。

广州市博物馆 广东省档案馆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系研究所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2期（总第14期）

編輯者：理论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2月2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